

系體全安會社VS. 機危政財

—府政&場市越超—

■ 鑫世黃 ■

壹、導論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陸游的遊山西村詩，前一句正反映二十世紀末的台灣，正面臨內憂外患之困窘。不過，在面對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如果能夠「除舊佈新」，「擇善固執」，「三思而後行」，後一句未嘗不是希望與生機。

一、問題緣起

剛好在德國第一個社會醫療保險立法後的一百一十一年，一九九四年全民健康保險亦在台灣立法通過，而緊接著「國民年金制度」又已蓄勢待發。然無論是全民健康保險，或國民年金，均是在一片紛亂中，勉強藉著連續不斷的選舉「效應」，始能克竟其功。對照於特別針對「弱勢」團體的社會立法，例如：殘障福利法、兒童福利法、和老年福利法等。這種現象不僅凸顯出，社會各界對這兩種制度的「屬性」和「必要性」之認知，仍缺乏共識，意見紛歧；更啓人憂慮的，為即時包括全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甚至失業保險等在內「社會安全體系」①，已「迫於形勢」，漸次落實之際，這種意見的紛歧，在各個層面似乎仍然存在「兩極化」的態勢。在社會各界，並非基於「生命共同體」的意識，以「誠心誠意」的態度，「同心協力」共同創造這複雜龐大的「社會工程」；而只是為遷就眼前的「政治現實」，著眼於「短期利益」的妥協，其所為的政策規畫，固然可以暫時的消

弭局部雜音，製造和諧的「社會環境」之假象，但就長期，包括後代子孫的「社會整體利益」而言，必將遺留「無可復原」的殘害^②。尤其當政府財政又面臨「危機」之際，其意味著政府已無擺平「利益衝突」的籌碼，更將加深「兩極化」的發展。因此，如何一方面透視各個不同層面的「爭議」焦點，另方面體認當前台灣的客觀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將「異議」昇華成為「共識」，乃為建立一套「長治久安」的社會安全體系之基本前提。

審視意見分歧的主要來源：首先，在政治層面，由於「解嚴後」民主政治的落實，政黨政治的競爭形態，已稍具規模，主要的執政黨——國民黨，與主要的在野黨——民進黨，對社會安全體系之「政策優先性」的認知，有顯著的差距；導致這種差距的原因，除了因現實的「選舉策略」之考量外，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歧異，亦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國民黨承繼四十餘年來，以「經濟發展」為最高優先的歷史任務，以及囿於龐大黨營事業的經濟利益，難以切斷與工商界的臍帶關係，對社會安全體系的「觀念」，仍相當保守；似猶停留在早期以「社會救助」為主的消極「濟貧」時代的認知。民進黨，則以勞工和弱勢團體為主要訴求對象，傾向近乎社會主義式的福利國家，主張以「國家撫卹」為主的安全體系。其次，在社會層面，由於「解嚴後」社會多元化的發展，已粗具雛型。在決策過程中，過去代表資方的工、商界主導的情況，已明顯式微；以勞、農為代表的「弱勢團體」已有相當的組織，並已能發揮影響力，而與資本家相抗衡。因社會安全體系關係彼此間的切身利益，勞、資立場的「對立」，本來就沒有什麼

特別之處，只是在台灣的經濟發展，已邁入「後資本主義制度」的階段，此種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勞、資對立」意識，卻仍然盛行，顯示我們的社會結構必定存在某些問題。以上這兩個層面，基本上，屬於「實務」層次。第三為學理的層面或「理論」層次，亦由於「解嚴後」的學術自由化，平時「各自為政」的各個不同領域的學者，一夕之間，似乎均有了共同的研究主題。惟由於專業知識的背景差異，和意識形態的「衝突」，代表自由派的「市場經濟」學者，為維護市場經濟的信念，與關懷社會弱勢團體的「社會工作」學者，為維護社會正義，對與社會安全體系的相關問題，往往難有交集。

這三個層面兩種層次的意見歧異，若再詳以解析，理論層次的爭議，為主要的根源。且由於一方面對社會安全體系，這項「社會工程」的「本質」和「內部結構」，欠缺應有的認識；另方面，對蛻變中的當前台灣社會之「政治經濟結構」，未能確實掌握和深刻體認，學者間的議論，最後都呈現在空泛的意識形態，和一些細微的枝節性問題。此亦即台灣的學術界，對現行西方國家社會安全體系的成長，和其在一個民主、多元化的資本主義社會所扮演的角色之認知，有一百年的空白。所以，在政策規畫的實務層次，又陷入「政府與市場：孰輕孰重？」，「效率與公平：何者優先？」，「成長與分配：如何兼顧？」等「規範性」的抉擇困境。尤其在政府財政赤字日益嚴重的時候，「社會安全體系」的「財政赤字」的「實證性」問題，又成為決策者面對的現實難題。

二、他山之石

「歷史係一面鏡子，尤其是他國的歷史，更足供借鏡」^③。檢視台灣當前推動建立社會安全體系所面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與十九世紀八〇年代的德意志帝國，制定第一個「全面性的強制社會保險法案」時，似有其類似之處：政治利益的衝突與意識形態的分歧，均是制度規畫與設計的最大障礙。惟為何德意志帝國的這個制度，在一百一十一年後，並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的摧殘，仍能延續成長，「共識」，尤其是對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形態」的共識形成，也許是唯一可以解釋的因素。一八八三年，在面對資本主義的「社會現實」，和Karl Marx科學社會主義的「社會理想」之夾縫中，以歷史學派為主的所謂「講壇社會主義」者，發明以「社會保險制度」為主的社會安全體系，配合Otto Bismarck的政治統御，成功的反制「社會主義思想」的蠱惑^④。

一次世界大戰後，德意志共和國一九一九年制定的威瑪憲法，雖然將經濟、社會「生活」，明列於第二篇「人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之中，但是在社會保險制度猶未能及時成長茁壯之際，資本主義的「社會現實」——經濟恐慌，再度激起科學社會主義的熱潮。不同於Otto Bismarck，這次，Adolf Hitler借「攘外」以「安內」，並採行所謂「組織的資本主義」，以國家社會黨為唯一的統治者，結合大資本家，透過嚴密的組織和高壓統治，排除異己，掌控政治、經濟、與社會等階層。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一方面，為

防堵共產制度的蔓延，另一方面，為加速經濟的重建，並避免資本主義的亂源再生，實施「社會的市場經濟制度」(Soziale Marktwirtschaft)。不同於一九一九年的威瑪憲法，一九四九年的基本法已無專章規範經濟、社會「生活」。所以，社會的市場經濟制度，係在「共識」之下的產物，並非基本法所強制，但其亦不違背基本法之規範。社會的市場經濟制度係依循Walter Eucken等Freiburger Schule所提出之Ordo-Liberalismus。雖然，一方面有鑑於納粹統治時期，「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強力干預與管制，其堅決主張：維持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但另一方面，為防制社會主義制度的誘惑，除了強調市場經濟的自由，係建立在「公平競爭」的基礎外，「社會安全體系」亦是市場經濟體制中的主要構成要素。所以，有別於「天真」的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Laissez-faire Liberalismus)^⑤，Ordo-Liberalismus體認經濟生活中「權力」(Power, Macht)^⑥是一切問題的根源，必須加以規範。

三、回歸本土

Karl Marx曾經預言：資本主義終將被共產主義埋葬。惟何其不幸，當一九八九年東歐及蘇聯一夕之間解體，百餘年來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競爭似乎已有明顯的結果。而國內標榜「自由」的「主流」市場經濟學派，與維護「法統」的「非主流」國父遺教派，均雀躍萬分，終於得到「歷史見證」；更加堅信「自由化」的市場經濟路線，甚至執政當局亦與之相呼應。趕著在二十世紀結束前的九〇年代，提

出「供給導向」的「連戰主義」，以便與八〇年代英國的「柴契爾主義」和美國的「雷根主義」相匹配。得以並稱本世紀的三大保守主義^⑦。

關心兩岸關係者，對中共的經濟路線，亦寄以厚望。企盼如同一九九〇年十月三日，西德的「社會的市場經濟制度」統一德國，我們所期待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偉大時刻，亦已來臨。只是對什麼是「三民主義」，似乎只有「教條」而無「實踐」。對以市場經濟為主的「台灣」資本主義，半世紀來，究竟帶給台灣人民何種生活，亦視而不見，無動於衷。

四、方法論

由於前述問題的根本，一方面，在於台灣的社會科學「龍頭」——經濟學，長久以來，一直囿於「新古典經濟」典範的束縛，未能擺脫「政府vs.市場」^⑧之二分法的迷思；另一方面，且對社會安全體系亦迄未曾有系統的加以探討，未能體認社會安全體系之本質。因此，為了避免因「意識形態」爭議，而產生無謂紛擾，本文的主旨，首先在撥雲見霧，祛除新古典經濟典範之迷思^⑨。其次，藉著典範的轉移，就「應然」和「實然」面^⑩，解構「我們」台灣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賦予社會安全體系之應有面貌和時代任務。

在台灣「封閉、保守」的學術環境，要探討這個主題，必須承擔相當大的「學術風險」；隨時應付來自受意識形態主導的「主流、專業」的經濟學界的干擾，為避免浪費稀少性時間，做無謂的辯護，本

文開宗明義即提出：本文係採用「經濟社會學」(Economic Sociology)，和傳統「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的觀點。因無論是財政赤字或社會安全體系，均直接關係「個人」的「經濟福利」，或因「國家」資源的「稀少性」而引起，此亦即一般所謂的「經濟問題」。惟就經濟問題的本質而言，並無所謂「純」經濟問題。也就是，如果經濟人是理性的，如果所得分配是公平的，如果市場是健全的，如果……，如果……，那麼應該沒有「任何問題」。問題是「有問題」，但卻不是「經濟」問題。所以，所謂經濟「問題」，應該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同時，社會問題、政治問題應該是「經濟因素」所引起。換言之，「經濟」本身不是問題，有問題的是政治與社會。因此，探討經濟問題，必須由政治與社會等各層面著手。

傳統「政治經濟學」係由政治層面延伸到社會層面，「經濟社會學」剛好相反，由社會層面上推到政治層面。所以，分析財政問題比較著重傳統「政治經濟學」之運用；分析社會安全體系比較著重「經濟社會學」之運用。惟不論是傳統「政治經濟學」或「經濟社會學」，就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觀點，或其思想淵源，兩者事實上並無明顯差異；而且兩者的再興，均是針對主流的新古典經濟思潮的「反動」^⑪。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主要均在破除「政府vs.市場」二擇一的二分法。一方面，人類社會的經濟「問題」不在生產（或資源配置），而在分配，「利益的衝突」是主要問題之所在^⑫，因此，「權力」包括經濟力與政治力的互動，是分析問題的要素。另一方面，要探討

人類社會的經濟「問題」，必須掌握現實社會之政府「&」市場的互動，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發展對社會結構的衝擊；而解決人類社會的經濟「問題」之道，不應託寄於「海市蜃樓」，或貿然對經濟活動「直接介入或干預」，而應省酌社會之「實況」，塑造一個「有規律」的政治經濟「環境」^⑬。

為何在這篇論文一開始，就先探討這個似乎是“Common Sense”的東西，在此借用Stewart的問題：“Why begin the book by looking at methodology?”和答案..

"Our purpose, and that of our contributors, is not simply to describe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it is to place current economics in perspective. This giving of perspective, we believe, is one of the prime functions of methodology.

At base, the methodologist's task is to pose some simple, direct and possibly uncomfortable questions to economic theorists and practitioners. For example:

What are we doing?

Why are we doing it?

Are we doing it right? And

what does 'right, mean, anyhow?

What use are our results to anyone?"^⑭

貳、政府 vs. 市場

「台灣」新古典經濟學之迷思(Myth)^⑮

自政治解嚴和公共政策「民主化」以後，供給與需求的增加，形成「百家爭鳴」的完全競爭言論市場，尤其在電子媒體壟斷的局面，逐漸瓦解之際，社會各階層、各行業的人士，不論是專家或業餘，不管是局內或圈外，均「有話要說」。惟無論是經濟政策、環保政策、人口政策、教育政策，包括媒體政策、社會政策在內，各種意見儘管有相當大的歧見，但最終均回歸「政府或市場」應扮演角色的爭議。似乎在人類社會生活的空間，除了政府與市場之外，沒有其他；同時，政府與市場又似乎水火不容，僅能擇其一^⑯。因此，公共政策的規畫與制定，能夠迴旋的空間，受到相當大的限制。

這種「兩極化的二分法」之意識形態的形成，除了在實務面，因一方面「結社自由」長期被壓抑，另一方面「法定」的民間「社團」，被官方「收編」而「政治、政府化」，致四十餘年來的台灣社會結構，存在著民間社會「空洞化」的現象外，在「價值體系」方面，經濟學者「有意無意」的獨尊「新古典經濟」典範，亦是重要因素；一方面，實證意義的「利己」之心，在效率的追求之下，被「規範化」，致使原本「非營利」的「財團法人」，亦被「財閥」「納編」為關係企業，而「經濟、市場化」^⑰，另一方面，影響更深遠的，為「功利導向」的行為動機，成為台灣社會的「唯一」合情、合理、合法的行為

準則。所謂「經濟誘因」成為解決問題的唯一法寶^⑮。「競租」(Rent-seeking)已成為台灣社會生活的唯一目標和行為規範。

台灣的經濟學者，真應了「人在廬山，不識廬山真面目」這句話；台灣的經濟學者，由大一接受「經濟學」的啟蒙，經「經濟學」博士的專業訓練^⑯，到成為「一派宗師」，泰半均係在「新古典經濟」的「世界」中成長、茁壯。每天想的、做的，幾乎擺脫不了「新古典經濟」的思維模式。在對新古典經濟「典範」毫不質疑，毫無保留的接受，對新古典經濟之內涵和思想體系，自亦少有議論^⑰。因此，未受過正統經濟學訓練、或非專業經濟學者，如要與之對話，必先掌握新古典經濟「理論」的精髓，否則，難以理解，亦無法溝通^⑱。

一、新古典經濟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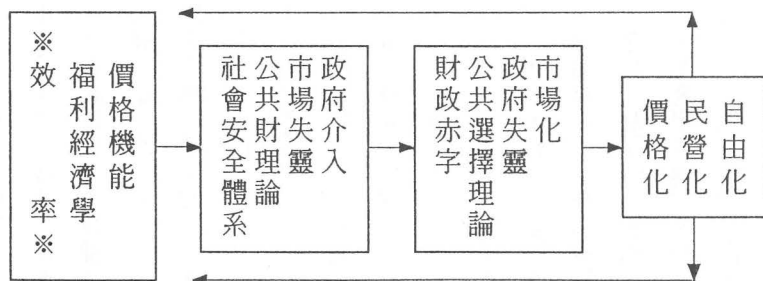
邏輯和典範形成

就經濟學界的「觀點」，討論社會安全體系和財政赤字這兩個問題，基本係受制於新古典經濟的「典範」^⑲，其理論邏輯架構，如圖一：即一方面，純粹侷限於資源配置「效率」的「價值觀」，所以，在「規範」(normative)面，也就是應否建立「社會安全體系」，馬上陷入「效率VS.公平」的兩難困境；另一方面，雖就「市場失靈」給與社會安全制度合理性基礎^⑳，但在「實證」(Positive)面，緊接著又以「政府失靈」否定之，而財政赤字就是政府失靈的具體病徵。所以，根據新古典經濟典範，對社會安全體系必然產生「偏見」；其餘了會有損市場經濟的「效率」外，更會導致財政危機。

新古典經濟典範，係隨著政

治經濟學漸漸「演化」為經濟學而轉移。在這演化過程中，不僅名稱改了，研究主題及本質轉移了，同時，研究方法也與社會科學，也漸行漸遠^㉑。惟這種演化，並非「進化」，而是「退化」。本來就早期的新古典經濟的學者而言，政治經濟學^㉒是一種「positive」的科學，本質上與自然科學相同，係一種以社會的「facts」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主要目的在於發掘社會真相：

truth，故有別於與以研究人類社會生活的「規範」(Prescribe rules of life)為主的神學或人文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其次，由於經濟的「facts」或現象，並無法由相當複雜的「社會現象」中，孤立出來，而且社會科學不能如自然科學般，可以採用「實驗」(experiment)的方法，所以，事實真相的發掘，只能運用「演繹」的方法，而無法由「經驗」中取得。所以，經濟學係屬「抽象科學」(abstract science)。不過，到了十九世紀末，新古典經濟



圖一 效率 > 公平 市場 > 政府

典範開始形成，一方面，由於「研究主題」的轉移，奧地利學派特別強調演繹的抽象分析²⁸，另一方面洛桑學派採用自然科學的「世界觀」，配合劍橋學派的功利主義，特別強調「理性邏輯」的演繹。惟由於「理性邏輯」演繹的運用，並無法分析複雜的社會現象，所以，爲了遷就這種研究方法，經濟學的本質開始產生「質變」，其並不以社會的「facts」爲研究材料，所以，就產生所謂的「假設爭議」²⁹，也就是經濟學的研究，所得出的「事實真相」到底是什麼？經濟學的研究「目的」何在？經濟學的「價值」到底在哪裡？針對這些爭議，Friedman以「轉移視聽」的手法，以「預言的準確性」，作爲科學研究的評價準則。但所謂預言準確性的判定，一爲「理性」，其係以「數理」邏輯呈現³⁰；另一爲「精準」，即以「量化」的精確度來衡量³¹。這也就是現在所了解的「新古典經濟典範」³²。

二、新古典經濟學之研究主題³³

效率vs.公平

經濟學究竟屬於哪一科學領域，或採用哪一研究方法，關鍵在於其「研究主題」和「世界觀」(Weltanschauung)。學術研究係相當「昂貴」的，學術研究者應係相當「理性」的。所以從事學術研究，並不容許無病呻吟，亦非只是爲爐邊說「故事」，而必須是「問題導向」。所以，就經濟學而言，首先要質疑的：到底什麼是經濟問題？經濟問題的「本質」究竟爲何？經濟問題是否爲社會問題？還是所有的社會問題均是經濟問題？如果是前者，那麼社會問題又是什麼？

十九世紀中葉，當政治經濟學逐漸發展爲經濟學³⁴，也就是新古典經濟開始萌芽、茁壯，並成爲「Normal Science」主導經濟學的成長，關於經濟學的研究主題，就逐漸產生爭議³⁵。新古典經濟在世界觀，係承襲古典經濟的「自然均衡」思想，不過，由於「時、空」轉移，新古典經濟所關心的主題，與古典經濟、或傳統政治經濟學有很顯著的差異。

經濟學者所關心的雖然亦是人類社會「整體」的經濟福利，但由於受到「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影響，這裡的「整體」係由許多「個人」機械性相加而得出。而且亦由於對「市場機能」的信賴，因此，只要每個人自身的經濟福利達到最大，就表示社會「整體」的經濟福利爲「最適」(Pareto optimum)。因此，經濟學者的研究主題就侷限於「如何讓個人在資源稀少的基本限制條件下，經濟福利達到最大」，也就是「效率」問題。這個主題雖然又包括「生產」和「消費」，但究竟「如何」才能讓個人在資源稀少性的基本限制條件下，經濟福利達到最大！由於「理性」經濟人的堅持，個別的生產者和消費者「自會」做最適的選擇，不容他人置喙。在「老天是公平的」、「市場是完全的」、「個人是理性的」等三大「堅持」之下，所謂「稀少性」的經濟問題，自然而然就已經解決了。不過，既然經濟問題已經解決了，新的問題卻產生了，那就是經濟學者到底研究什麼？因此，經濟學內容的貧乏與空洞化，也就不足爲奇。

由於一方面經濟學向來只關心社會「整體」的福利，在Homo oeconomicus的前提下，並不涉及個人和個人間的福利分配；另一方面

更由於相信市場的功能，對任何「後天」的人為「重分配」，均認為其會損及社會「整體」的福利，這也就是「效率vs.公平」——勢不兩立(Big Trade-off)，在這「二擇一」的困境，一方面因受「實證論」的影響，認為效率比較客觀，另一方面基於「自然正義」的哲學，故效率凌駕於公平之上^{③④}。

雖然在新古典經濟的長期掌控之下，經濟學仍然想當然的被視為社會科學領域的一員，而且相對於比其年長的政治學，和比其年輕的社會學，亦已成為「最強勢」學門。但無論究其研究主題、內容或研究方法，不知不覺中，經濟學實質上已淪為自然科學中的一個旁支。在研究主題方面，其主要係研究「人」這種「理性動物」的經濟行為，與動物學者研究猩猩或猴子的行為，似乎看不出有何不同。在研究方法方面，無論是所使用的「概念」、或分析「工具」，與物理學亦無啥差異。至於其基本「世界觀」，則一方面借用宇宙日、月、星辰的「均衡運行」，另一方面，擷取生物界所謂達爾文主義「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演化論。

經濟學這樣的發展，固然讓其博得「科學」之名，並且在社會科學中亦取得「武林盟主」的地位，但相對的，其內涵，也就是對「人類社會」的了解，也被掏空。反而不如研究其他群居動物的動物學者，對蜜蜂「社會」、猴子「社會」的了解。所以，如果「經濟學」運用來解決生活於原始、蠻荒世界的泰山、或魯賓遜的「問題」，應該相當有效(powerful)，但如拿來分析涉及「人性尊嚴」和複雜的「人際關係」，可能就會發生水土不服。

除此之外，不同於動物學，由於研究者本身即是被研究的對象^{③⑤}，所以根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原理，研究者只要研究室中冥想即可，連科學研究最基本的首要工作：觀察，都可以省略。不過相對的，經濟學的學術貢獻究竟有多大，亦值得重新加以評估。

三、新古典經濟學之方法論

prediction or prescription?^{③⑥}
除了由理論邏輯和研究主題，剖析新古典經濟學外，由方法論^{③⑦}的觀點對其內涵加以透視^{③⑧}，對經濟「理論」和「實務」更能確實掌握。J. N. Keynes在說明為何關於經濟問題常有「似是而非」的意見時，曾有這樣的描述：

"Broadly speaking, the general tendency of popular economics is towards rash generalizations and fallacious arguments 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 This is frequently combined with an imperfect analysis of fundamental conceptions, leading to confusion of thought and the selection of false propositions as self-evident postulates, and where deductive reasoning is employed, its results are often applied without regard to the conditions requisite for their valid application."^{③⑨}

(一)規範(normative)VS.實證(positive)^{④①}：經濟學通常稱為「

實證經濟學」，所謂實證係對應於規範，即前者係探討「What is...」，後者為「What ought to be...」區別兩者的主要目的在於，後者含有價值判斷，前者為價值中立^④。不過，研究方法論者均了解，社會科學的方法論的爭議，由最初以Schmollers為首的德國歷史學派與以Carl Menger為首的奧地利學派，對於歸納與演繹的爭論，歷經Wiener Kreis的「logical positivism」，至Karl Popper的「critical rationalism」最後為法蘭克福學派的「critical theory」社會科學的研究，無論是其知識的來源、假說的證實或判誤，均難以如自然科學，訴諸「客觀」的經驗或實驗，同時社會科學是否有絕對客觀的「道理」也幾乎沒有爭議。所以除了法蘭克福學派的「critical theory」外，Thomas Kuhn\所謂「paradigm」亦在於強調：社會科學領域中並無「永恆不變」的「真理」，故規範與實證之區別，不僅並無太大的意義，而且相當「危險」。因此，如果經濟學是社會科學，其並無法做到如Max Weber所言的「價值中立」。也因此，所謂「實證」經濟學的「實證」之意義，似乎只是具有如McCloskey^⑤所謂的「rhetoric」^⑥的意涵。

其實，「實證」本來只是針對「社會科學」的本質，為特別強調其並非「形而上」(metaphysic)，而有別於「神學」或「人文科學」，也就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一樣，係以社會之「事實」(facts)為主要的研究對象^④。不過，由於社會之「事實」，畢竟不同於自然界之事實，能夠明確的「客觀」認定。但因為對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學——研究「主題」的不同，對社會科學的本質的看法，就產生分歧

。其中主要的爭議在於：社會科學的研究者，能否擺脫「主觀」或「價值觀」的束縛，也就是具有「價值中立性」。這主要牽涉其是否會受到「倫理」、「傳統」、或所謂「文化」等「社會因素」的影響；或這些社會因素，可否由社會事實中加以排除。至此，所謂「實證」就相對於「倫理」，也就是「實證」與「規範」之分。同時，有關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爭議，也肇始於此。由於要將「倫理」、「傳統」、或所謂「文化」等「社會因素」，由社會事實中加以「淨化」，至少到目前為止，尚無有效的辦法^⑤。因此，批判理論，在接受價值判斷的同時，主張透過「辨證法」，以不斷的質疑、批判，維護理論的「客觀性」；而新古典經濟的典範，則主要係透過個人的「理性的邏輯」來維護其「價值中立性」。也因此，新古典經濟的模型，自然而然的與社會事實脫節，所以，Friedman以「預言的精確性」，定義「實證」。實證「科學」變成實證「方法論」，此亦即：本來實證之意義主要呈現在經濟學之「科學本質」，到Friedman，被轉移為「科學的定義」^⑥。

(二)實在(reality)vs.預言(prediction)&真實(truth)vs.準確(precision)^⑦：由於社會科學〔含經濟學〕的研究，無論是其知識的來源、假說的證實或判誤，均難以如自然科學，訴諸「客觀」的經驗或實驗，所以，一方面難以僅根據對「事實」的觀察建立模型，另一方面，模型化所得的「假說」亦無法由「經驗」中加以「證實、判誤」。同時，如前所述，社會科學的研究者，亦是被研究的一部分，所以科學研究的求「真」的真，如果指的是「客觀的事實」，那麼在

社會科學的領域中，幾乎找不到。不過，經濟學者除了自稱為「實證」科學，堅持其為「客觀性的科學」外，一方面亦採用 Milton Friedman 的方法論，這種方法論，提供給經濟學者莫大的方便。其另闢蹊徑，自行訂定「科學規範」^{④⑧}，「以準確預言取代實在」，免除「觀察實在」的麻煩和困難。不過，根據與「實在」脫節之模型所得假說，究竟「要或能」預言什麼！且不論是證實或判誤，所謂預言的「準確」，其意義為何？又究竟根據什麼來判定？

第一個問題，關係經濟「科學」研究的目的，為應付這個問題，經濟學亦借用自然科學的「理論」(theoretical)與「應用」(applied)科學、或「理論」(theoretical)與「實證」(empirical)之分，並更進一步，特別強調「純理論」(pure theory)^{④⑨}，其目的無非是為擺脫他人對其「失實」的質疑。至於第二個問題，則與第一個問題有密切關係。首先，在定義上，根據與「實在」脫節之模型所得假說的預言之「準確性」，必然是「恆為真」，而能夠得到「恆為真」預言的「理論」，有兩種：其一為「真理」^{⑤⑩}。真理又有兩層意義，一為宗教式，一為普通常識；前者「不科學」；後者「無意義」。所以經濟學同時兼具此二極端。其二為「理性」。即以抽象的「數理模型」為唯一的理論模型，透過乾淨俐落的數理邏輯「分析」，可以將焦點精確的集中到一定的「參數值」範圍^{⑤⑪}。其次，將所有的複雜問題，濃縮、「量化」到以少數的「數字指標」呈現^{⑤⑫}，並以之作為判定基準。即所謂數字會說話。這種作法，基本上，係轉移視聽：以精準遮蓋「失真」。

(三)個體(micro-)vs.總體(macro-) & 部分(Partial)vs.一般(General)均衡：在研究分析對象，社會科學向來只有總體問題而無個體問題，雖然自從運用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個體經濟取代了總體經濟。但個體分析只是手段，其最終目的亦在於解決總體問題。不過在將個體的分析結論，運用於解決總體問題時，在「融合」方面，面臨無法克服的障礙，而趨向兩極。有者持保守態度，採二分法，即個體與總體分離，個體分析已自立門戶，脫離傳統政治經濟學的領域，個體分析便成為「民間企業」的重要分析工具；總體經濟則以「總體指標」為操作對象。有者則藝高膽大，即以一當十，以十當百，以百當千，以千當萬，直接將個體的分析結論，當作總體模型使用，所謂的“micro-foundation”，實質上等於是「理性獨裁」、「個體獨裁」。在個體與總體之間的社會結構與社會關係，完全被排除^{⑤⑬}。

與此相關的，在經濟「關係」方面，經濟學在整個的思想體系為一般均衡^{⑤⑭}，不過，在分析工具則只能運用部分均衡^{⑤⑮}。部分均衡與一般均衡的關係就如化學或物理學的「實驗室實驗」或「實體」。實驗室實驗的結果，與實體是否相符，一方面，關係假說是否可經證實而晉身為理論，另方面則與理論是否具有實用價值有密切關係。惟經濟學畢竟不是自然科學，部分均衡的分析亦非實驗室實驗，而部分均衡的分析的結果，亦不能移植於一般均衡。部分均衡的分析的目的究竟何在，似乎就不是那麼清楚。很不幸，經濟學者慣常將在嚴格限制條件下部分均衡的分析直接用來分析現實社會。

本來一般均衡與部分均衡的關係，早在Walras之前，Cournot就曾提到：

"Long before Walras, Cournot had realized that 'for a complete and precise solution of the partial problems of the economic system, it is inevitable that one must consider the system as a whole'." ⑤⑧

也就是部分均衡是研究對象，但是因社會是一個整體，所以，在研究方法和問題的掌握，應該有「一般均衡」的概念。不過，Walras提出一般均衡「理論」在新古典經濟中，只是一種「世界觀」⑤⑨。根據這種世界觀，新古典經濟只要分析部分均衡即可，因只要部分達到均衡，透過不可見的手，在一般均衡的環境下，其最後結果「必然」圓滿，也就是「Pareto-optimum」。只是Walras的這種世界觀，並非針對現實世界，而是「空中樓閣」。

"It is usually taken for granted that he was trying to investigate, at an admittedly abstract level, the workings of a 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 economy. After a lifetime study of the Walrasian system, however, William Jaffe became convinced that it was never Walras' intention to construct anything like a realistic description of a competitive economy but rather to show that a rationally consistent economic system could be devised that would maximize social

welfare by securing both commutative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⑤⑩

除此之外，新古典經濟學者，在將部分均衡分析結果，運用到一般均衡時，往往忘了或曲解：一九五六年Lipsey and Lancaster所提出的"Second-Best"理論⑤⑪。事實上，Lipsey and Lancaster所提出的"Second-Best"理論，等於是宣告新古典經濟典範：「福利經濟理論」的「破產」。

(五)相關(correlated)vs.因果(causal)：統計學上的回歸分析，通常只能做相關性高低的檢驗，而無法做因果關係的分析⑥②。由方法論的層面加以探討，如果說運用「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則理論的研究，基本上應先根據因果關係的「邏輯」分析，建立假說，然後再運用統計學上的回歸分析之技術，由「實」際經驗中所得的數據，對此種因果關係加以驗「證」。也就是，理論（應該是：假說）模型的建構，與實證分析的「檢驗」，缺一不可。

不過，新古典經濟學將理論與實證分離。所以，假說未經「驗證」，即晉升為理論；而「實證」的新古典經濟學，則經常「本末倒置」，便宜行事。忽視假說的建立，只是運用回歸分析，「撮合」兩組隨興而得的數據，然後透過技巧，或甚至欺瞞的手段，企圖以科學的假象，建立權威。並根據其結果，以穿鑿附會將相關擴張，賦予因果關係⑥③。

參、經濟社會學、政治經濟學 vs. 主流經濟學

典範之轉移^{⑥2}

由前述對當前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解構」^{⑥3}，主要在剖析新古典經濟之「典範」，惟目的不在「否定」新古典經濟學，而在提醒台灣的經濟學者，這種典範係於一百年前形成，有其「時空」背景，其雖已成為主流，但亦同時表示已成為「陳腐」的理論。因為在一個所謂「後工業化」(Post-Industrial)的資本主義社會^{⑥4}，一方面，產業的「垂直整合」和企業的「財團化」之發展，另一方面，產業公會或專門職業公會的形成，使傳統的「獨佔」和「壟斷」之面貌，完全改觀，由地上轉入地下。所謂“Anti-trust”〔或我國的公平交易法〕，已失其功能。新古典經濟所仰賴的「市場」，在經濟活動中，已被排擠，取而代之的是：財產的「合縱」(Eigentumsverflechtungen)與職業的「連橫」(Berufsordnungen)^{⑥5}。除此之外，經濟學，具體而言，只是「市場」經濟學，應只適合當作企業管理學的基礎課程，而非「國家或國民」經濟學。

至於為何以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經濟學的典範，取代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典範？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擬借用Schumpeter的論點：第一，經濟社會「問題的肇因」，存在於經濟社會制度「內部」，而非如新古典經濟的一般均衡，所謂的「外在因素」的干擾。第二，經濟理論研究的目的，在於找出主導經濟社會制度持續不斷變遷的「力量

」(Kraft)，或存在於經濟社會制度「內部」，干擾經濟社會均衡發展的「能源」(Energiequelle)^{⑥6}。所以，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經濟學的典範，係一種「動態分析」，而非如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典範，為一種「靜態分析」^{⑥7}。

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經濟學的典範，基本上可溯源至德國的歷史學派^{⑥8}，且其再興，亦係針對經濟學的「信心危機」，而產生的反動^{⑥9}。政治經濟學主要著眼於：國家(Staat)與經濟之關係，或政、經互動。經濟社會學則關注社會(Gesellschaft)與經濟之關係，比較重視社會結構的變遷。

一、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政治經濟制度

政治經濟學內涵^{⑦0}：第一，並無「純實證」(purely positive)的政治經濟學，也就是不只探討：What is“，同時探討：What ought to be“，兩者無法區分。第二，政治經濟學係一種「倫理」(ethical)，其關係「人類生活」(human life)中最重要的問題；其不只是探討經濟活動的各種「動機」(motives)，同時亦應比較其道德價值(moral merit)。第三，其「堅守」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層面」(social side)，和經濟現象與其他社會現象的互動(相互依存)關係；所以，政治經濟學必須與社會科學的其他學門，緊密結合；且為確實掌握此種關係，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必須是「實在的」(realistic)，即以實際生活於社會中之活生生的人，而非「抽象的經濟人」為對象。第四，因經濟條件係隨時改變的，經濟理論的本質，只具有「

相對性的」的意義(relativity of economic doctrines)，也就是受到時、空的限制。第五，在研究方法方面，強調政治經濟的研究，係以對現實社會生活的持續觀察為基礎，並由其「理出頭緒」(generalizing therefrom)；並特別重視「通古知今」和「比較分析」。

根據政治經濟學典範的研究方法，為透過「政治經濟制度」橫斷、縱斷面的比較分析，掌握特定時、空背景之社會的經濟活動特質。也就是，一方面將不同的「國家」之經濟制度「類型化」^①，以勾畫出Max Weber所謂的「Ideal Type」，避免過度抽象化的「空中樓閣」的迷惑^②；另一方面，則強調「歷史因素」的重要性，因人類社會生活的變遷，係「演進」而非「革命」的，今朝的問題，係肇因於昨日，明天的幸福，寄望於今日。

二、經濟社會學與「合作主義」(Corporatism)

經濟社會學強調：經濟行為並非如孤島中的Robinson，只是個人的行為、個人的慾望、或願望，而是一定社會和歷史環境下的「社會行為」。其係受到社會的規範、制度和價值體系所影響。因此，對經濟行為的分析，必須掌握特定時、空之社會背景^③。經濟社會學與新古典經濟典範的差異，Smedberg等人曾有相當系統化的比較分析^④。

經濟社會學特別重視，政府和市場以外之「社會組織」，在現代多元化社會經濟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經濟社會學關注資本主義制

度之市場經濟，所產生的社會問題，和對社會結構的衝擊；但同時亦注意「政治」之社會基礎，並不完全依賴「政府」。所以，其強調以合作主義^⑤和團體意識為基礎，而形成的社會組織之功能^⑥。關於政府、市場和「團體」(Community)三種組織特性，Streeck和Schmitter以表一逐一列示。

三、福利國家與租稅國家^⑦

不同於新古典經濟的「方法論個人主義」，經濟社會學或政治經濟學係採取「方法論整體主義」(Methodological holism)^⑧，也就是其係就國家，或社會整體，和其結構，加以探討。在一個現代的民主資本主義的國家或多元化社會，政府與市場並非相互排斥，彼消我長，而是相輔相成，互為表裡。同時，現代的民主資本主義的國家，亦非如所謂「混和經濟制度」(Mixed Economy)所要表達的，只是：政府+市場的「機械性」(mechanic)組合。除此之外，政府與市場雖然是一個多元化的民主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機制」，但並非唯一。因此，討論「社會安全體系」，其並不侷限於政府對個人的社會政策，談到財政赤字，其並不僅就政府與人民的「收與支」，同時，對其而言，並無「分配與重分配」之分。

(一)福利國家VS.社會政策^⑨：在新古典經濟典範，社會安全制度係透過「社會政策」(social Policies)來表達，即採前述二分法，社會政策是「政府」干預「市場」的工具；是政府為了「公平」而犧牲「效率」。所以永遠在「公平」與「效率」的抉擇困境中，找

表一 團體、政府、市場特性比較

特 徵 項 目	團 體(Community)	市 場(Market)	政 府(State)
1.協調、配置原則	Spontaneous solidarity	Dispersed competition	Hierarchical control
2.行為主體	Families, Clans, lineages, communes, localities, sodalities	Firms/parties Entrepreneurs/ politicians consumers and workers/ voters	Bureaucratic agencies Subjects (taxpayers, law abiders, conscripts, etc.) civil servants, clients, claimants
3.參與條件	Ascriptive member status	Ability to pay/ eligibility to vote	Legal authorization, 'jurisdiction'
4.交易媒介	Esteem	Money/votes	Coercion
5.交易結果	Compacts	Cotracts/incumbencies	Authorative regulation
6.資源	Respect, trust, inherited status	Economic/political entrepreneurship, calculative rationality	Legitimate control over the means of coercion, authoritative distribution of position, 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expertise, procedural correctness
7.動機	Esteem of followers Belonging to group, desire to share in common values 'Satisfying identity'	Profit/electoral victory Material benefit/ exercise of 'voice' 'Maximizing advantage' 'Minimum winning coalition'	Career advancement, bureaucratic stability fear of punishment 'Minimizing risk' 'Maximizing predictability'
8.決策法則	'Common consent, unanimous agreement	Consumer/majority preference	Authoritative formal adjudication, imperative certification
9.財貨類型	Solidaristic goods	Private goods	Collective goods
10.衝突	Natives vs. foreigners Clan rivalries, generation gaps, conflicts over turf, inheritance claims, personal dispute.	Sellers vs. buyers/ parties vs. voters Capital vs. labour/ producers vs. consumers/incumbents vs. opposition territorial, ethnic, religious, linguistic, ideological divisions, etc.	Rulers vs. ruled Superiors vs. Subordinates Overlaps of jurisdiction Conflicts between levels of government, interstate rivalries, etc.
11.規範基礎	Customary practices	Property rights/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s	Formal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12.報償	Mutual affection, collective identity	Material propriety/ citizen accountability	External security, equitable and predictable treatment, efficient mobilization of resources

資料來源：Streeck and Schmitter (1985), p.5.

不到出路。且在「效率」凌駕「公平」的意識形態主導下，爲了經濟發展（成長）可以犧牲勞工權益，可以犧牲環保，因爲這兩者都會降低資本報酬率，妨礙投資；爲了保障「私有財產」可以犧牲文化、古蹟，因爲私有財產是「上天」所賦與，爲市場經濟的根本，神聖不可侵犯。如根據經濟社會學或政治經濟學的典範，其係以「福利國家」來表達。福利國家只是多元化民主資本主義制度的「現階段性」發展。福利國家的特徵，在於除政治權、市民權（財產權）外，尚包含社會權。其強調「個人」係生活於國家、市場、與社會之中，個人經濟安全的保障，除了仰賴國家與市場，尚須依存於社會團體。福利國家的社會安全體系，除了「政府」所提供的「國家撫卹」和「社會救助」外，主要是由各種依「同舟共濟」原則，而組成的自助互助的「社會保險」所構成，其主體爲具自主性的社會保險「團體」，而非政府，亦非企業。

(二) 租稅國家 vs. 財政赤字：當新古典經濟以總體的 GNP 來衡量個體的效率時，同屬新古典經濟的公共選擇理論，亦以「財政赤字」來證明「政府」的無效率。由於新古典經濟將一切經濟活動，均視同市場的「交易」，不懂財政之「量出爲入」，與企業之「量入爲出」，究竟有什麼不同；以爲財政赤字與企業的「虧損」，如出一轍，係：（收入）—（支出）=（—），所以，解決財政赤字的方法，不外乎「開源」、「節流」。問題是，開源意謂將「市場」的資源移轉至政府，將影響經濟發展。至於節流，在一個民主的多元化社會，在數千，甚至數萬項支出當中，究竟「節」哪一條「流」，恐

怕沒那麼簡單。

經濟社會學或政治經濟學，早期爲財政社會學，則強調「租稅國家」(Tax State)，以之與「企業國家」相區別。主要由整體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的變遷，例如由君主專制到民主，由封建到資本，由士族社會到市民社會，來分析財政赤字的形成。租稅國家會導致財政危機，癥結是經濟資源的「私有化」。不過，這並不表示，「所有」的經濟資源均不能私有化，而是，對某些經濟資源，像土地，就不宜私有化⁸⁰。例如土地私有化的結果，政府基於公共需要，便需出價徵收。等於將多數人的資源，移轉給少數的地主。其結果，不僅不公，政府的財政亦將增加負擔。

(三) 分配 vs. 重分配⁸¹：新古典經濟學基本上並不涉及「分配」問題，或者說，對新古典經濟學，根本並不存在分配問題。即使有，他們所關心的，亦只是由市場所決定的要素間的「功能性」分配，即要素價格的差異，此種差異的存在，亦是透過完全的要素市場，而反映的生產力差異。因此，在認可自然正義，即接受個人間所持有生產要素的差異，均是上天註定，因“endowment”和要素價格的差異，而導致家戶或經濟個體間的經濟福利分配的差異，不僅是可接受，且就效率觀點，亦是被鼓勵。所謂「笑貧不笑娼」亦是新古典經濟對分配問題最佳註腳。所以，「分配」與「重分配」(Re-distribution)之關係，就如同市場與政府的二分法，且兩者相互對立的。也因此，新古典經濟學者對任何會產生「重分配」效果的政策，不論歲出歲入，或任何管制措施，均持保留的態度。

經濟社會學或政治經濟學，則主要以分配為研究主題，且並無，也不能有分配和重分配之分，因為，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制度裡，所謂「人生而平等」只是具有規範性的意義，自出生開始的財富分配、後天人力資源的培養，均係在「政府」的主導下發生；例如遺產制度、教育制度等，甚至市場的運作，亦是在政府的規範之下。換言之，人並非生於「純市場」之中⁸²。所以，如依新古典的定義，就經濟社會學或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在現實的社會中，並無「分配」，只有「重分配」。且若強調分配與重分配的區分，均會產生維護「既得利益」的偏見。

肆、台灣政、經制度的演進

組織的vs.民主、多元化的資本主義

Molitor在分析社會政策之變遷時，曾特別強調：在比較各個不同時期的社會政策時，必須掌握三項要素：第一，主導的理念或意識形態(die dominierenden Ideen oder Ideologien)；第二，當時的經濟發展階段(die jeweilig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sstufe)；第三，政府型態和政治組織(die herrschenden Regierungsform und politischen Institutionen)⁸³。除此之外，「社會結構」似乎不應忽略。

就歷史的演進和延續，分析「現階段」的台灣社會問題，可上推至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因為，一方面，經過五十年來

「外來政權」的有意壓制，民國三十八年前的傳統遺產(legacy)已剩不多。二方面，研究社會科學比研究自然科學方便的地方，在於研究者本身就是被研究對象的一份子，所以，社會科學雖不能實驗，但可經由研究者本身的「經驗」，「體察」問題之所在。

一、「中華民國」憲法的政、經、社制度⁸⁴

在一個現代的民主憲政國家，探討「國家」或「政府」在人民經濟生活中，「應該」扮演的角色，就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而言，不能避開或漠視憲法的規範⁸⁵。因為，「憲法」係「群體」生活的最高規範。尤其是當一國的憲法為「剛性憲法」，憲法中對「經濟、社會」生活，有相當具體的規定時。

由於憲法係因應君主極權統治而產生，故其有關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表面上，雖然是為防止統治者的侵犯而設，但在進入民主政治的時代，實質上，則係針對「他人」而設，以維護群體生活的秩序。換言之，憲法中有關政府權力範圍和行使方式的限制，主要係為防止多數暴力危害少數的權益。因此，在實施成文憲法的國家，一個國家的基本政、經、社體制，往往具體呈現於憲法之中。惟由於缺乏一種可以為大家所接受的「最適」經濟、社會制度；同時，經濟、社會制度，往往係「演進」的結果，而非可以塑造，為免於「教條化」的箝制，除了社會主義的國家，以及二次世界戰前德國的威瑪憲法外，在各個民主國家憲法中，除政治制度外，對經濟、社會制度並無明確規範，也就是憲法除了對政治生活有週詳的規範外，對經濟、社會

生活，則通常只有基本原則的「提示」。

由於我國現行憲法係於近半世紀前，仿照威瑪憲法制定，相對於其他民主國家的憲法，其於第十三章基本國策的第三、四、五節，分別對「國民經濟」，「社會安全」，「教育文化」做了相當具體的規範：第一百四十二條明文規定：國民經濟應以三民主義為基本原則，實施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以謀國計民生之均足。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前段規定：中華民國領土內之土地屬於國民全體。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應受法律之保障與限制。同條第三項規定：國家對於土地之分配與整理，應以扶植自耕農及自行使用土地人為原則，並規定其適當經營之面積。第一百四十五條關於節制資本之規定：國家對於私人財富及私人事業，認為有妨害國計民生之平衡發展者，應以法律限制之。這些條款，如配合第十五條關於人民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等基本權利的保障，則所謂「民生主義」的經濟制度之輪廓，已清晰呈現出來。

在社會安全方面，第一百五十五條規定：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人民之老弱殘廢，無力生活，及受非常災害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扶助與救濟。除此之外，第四節對就業、勞工、農民、兒童、婦女之保護，以及勞、資關係，亦有明文。

根據這些規定，所謂民生主義，基本上，雖是採行「財產私有化」的市場經濟制度⁸⁸。但是，對私有化財產的持有和運用，亦有相當的限制。尤其是「土地」、「天然資源」，原則上，是「國有民用」；在私有資本方面，則加以節制。值得注意的是，憲法的這些規範，

大都是採用：「國家以法律……」，也就是，其並非由「政府」直接「干預」。因此，本質上，與德國的「社會的市場經濟制度」⁸⁹，極為類似。除此之外，若再加上有關「社會安全」的規定，則已具備所謂的「福利國家」的要件⁹⁰。不過，特別注意的，依據第一百五十五條規定，社會安全體系（或社會福利），係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老弱殘廢，無力生活者）和國家撫卹（非常災害者），同時，以社會保險為主；也就是，由政府直接介入者，只有後兩項。

由於長達四十年的戒嚴，憲法並未實踐，朝、野均已無視憲法的存在。且即時在解嚴後，朝、野亦均汲汲營營於「權力」之鬥爭，所謂「修憲」，亦只是權力鬥爭的「工具」。真正關係「國計民生」的「經、社條款」，在近半世紀的「時、空」隔絕，是否適用台灣，反而，完全被忽視⁹¹。

二、「組織vs.民主多元化」的資本主義

就比較政治經濟制度的角度而言，戒嚴時期的台灣社會，由於憲法已被擱置，除了統治者與社會基層的關係，以及人民對「國家」的認同有所差異外，其基本型態與納粹（國家社會黨）統治德國時期，極為近似，即為一種由政府與企業緊密「組織」而成的「資本主義」。

組織的資本主義（Organized Capitalism）係德國學者Arthur Schweitzer用來描述，二次大戰前納粹統治德國時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二）的政治經濟制度⁹²。這種制度的結構：第一，納粹「黨」在

Hitler的領導下，實施「一黨」極權統治；第二，納粹黨凌駕國家之上，並掌控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層面；第三，在經濟制度方面，雖然仍維持私有財產的市場經濟，但重要產業均由少數大企業獨佔或壟斷，並與銀行相結合；第四，納粹黨透過對物價和工資的管制，操控「利潤」，以控制大企業，並主導經濟的發展方向；第五，經濟發展為最高優先，並透過下列五項措施加速推動：(一)瓦解勞工組織和談判力量，凍結工資，(二)重建軍備和公共工程的建設，(三)控制進、出口貿易，(四)控制金融市場，(五)產業組織化。在這種政治經濟體系裡，整個社會形成以納粹黨為主導，包括特務機構、正規軍和大企業等權力核心^④。

在經濟層面，這種制度具有下列之特徵^⑤：第一，政府與企業之「經濟目標」相同；第二，政治力與經濟力相互糾結；第三，產業「公會」的組織由志願性改為強制性^⑥；第四，企業組織之內部「權力結構」改變，董事會具有絕對的決策權，股東大會只是形式上存在；第五，強制產業「卡特爾化」(Zwangskartelle)；第六，價格由民間具有特權之特定組織所決定；第七，政府對前述之價格具有監視權；第八，國防工業決定總體經濟的發展。

這種組織的資本主義，隨著德國的戰敗，政、經糾葛的關係，徹底解體。在戰後，便為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社會的市場經濟制度」所取代。

解嚴前的台灣政治、經濟結構和環境，與前述組織的資本主義比較，只有程度上的差異。首先，在政治上，亦是一黨專制統治，「黨

、國」，「黨、政」不分，且黨凌駕國家之上。黨的內部結構和組織亦頗為類似，即屬列寧式的政黨^⑦。除此之外，由於一方面，民意代表長期不改選，與民意脫節；另一方面執政者係「外來」，且只能掌握中央，所以，以經濟利益攏絡本地和地方士紳，並形成「中央集權」，中央掌控地方。其次，在經濟方面，由於亦面對社會主義的威脅，所以在意識型態上，屬於「極右」，且採市場經濟。同時，在厚實國力，準備反攻大陸的基本國策，以及透過生活的改善以穩定「人心」的策略之下，「經濟發展」^⑧被懸為最高目標，但國防建設最為優先。除此之外，為避免重蹈大陸失敗之覆轍，無論是對外貿、金融、外匯、物價、糧食，均施以嚴格的管制。在社會方面，雖然勞工以及各行各業，均有工會和職業同業公會，但均在「黨」的控制之下，其功能均遭「閹割」。其中，基於加速經濟發展的需要，資本家所組成的團體，相對的享有較大的「優勢」地位，而勞工團體則被壓抑。

在「政治」的壓制，因解嚴而解除，台灣一夕之間如同西方社會，已步入「民主、多元化」的資本主義時代。這種情形與德國二次世界戰後，雖有極為類似的地方。但不同的地方，第一，德國早已有相當健全的社會安全體系，而台灣只有所謂「德政」的政府施捨；第二，德國雖然戰敗，但國家意識強烈，台灣則有近一百年被殖民統治，普遍存在認同危機，缺乏「同舟共濟」的情感；第三，德國的社會結構相當穩固，而且有「社會的市場經濟制度」，台灣雖有民生主義，但只是教條。更重要的是，德國的組織的資本主義，係因戰敗而解體。所以，「舊勢力」幾乎完全被剷除，而台灣係和平轉移，原來的統

治結構，仍然存在。

由於一方面，在組織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經濟資源「分配不均」的結構，已經形成；社會結構也已解體。另一方面，在這種層層箝制的體制下生活近五十年的人民，也已逐漸被塑造成輕視國家、漠視群體、敵視政府、藐視市場的性格。所以，在戒嚴解除之後，「民主化」的結果，將一切社會的「亂源」完全釋放出來。「紛亂」或「社會的解體」，便由各方面紛沓而來。無論是社會安全制度的訴求，或財政危機，均只是這「失序」階段中，衆多紛亂現象的一部分。

伍、解套

超越市場&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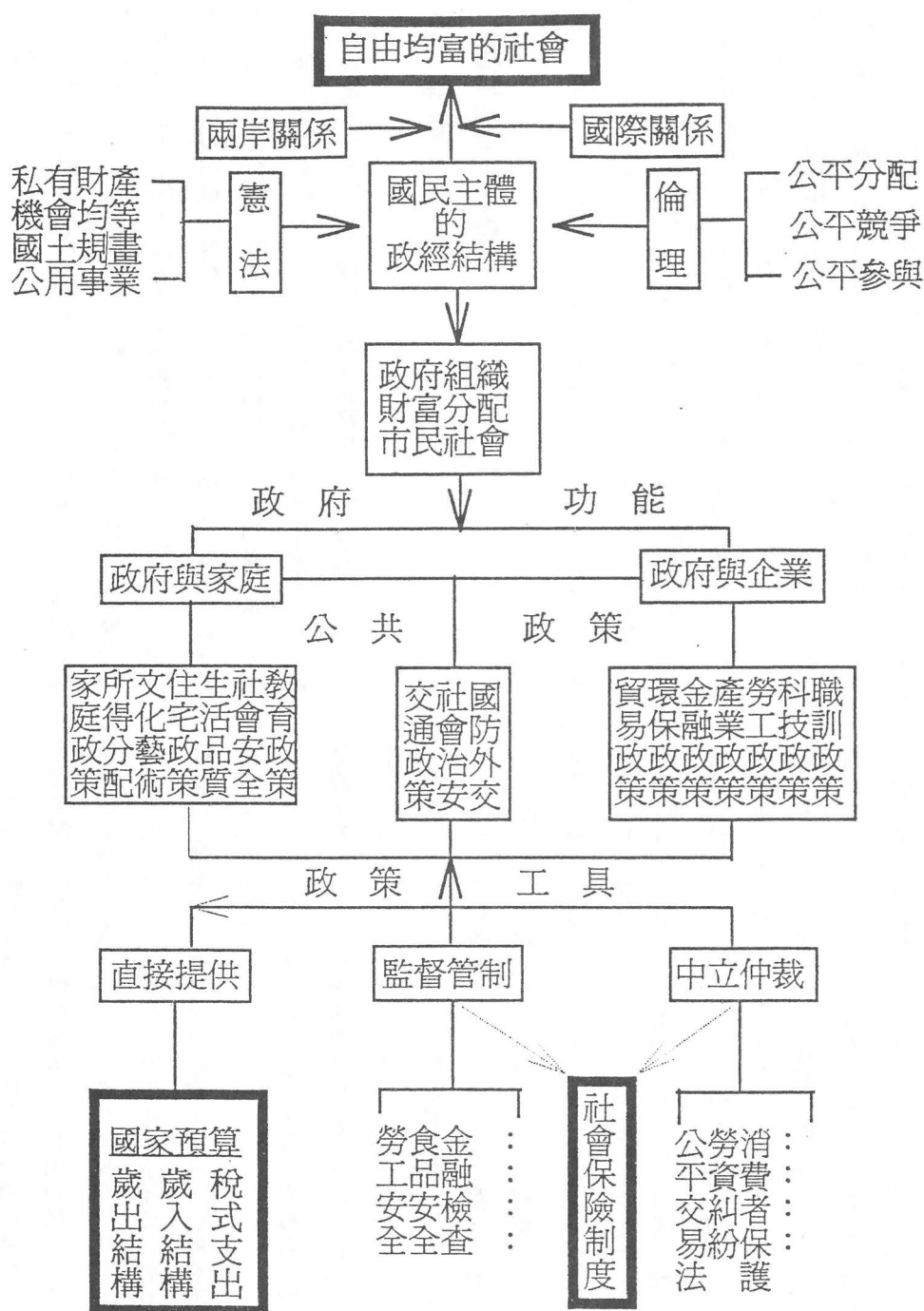
最近坊間出了一本會議論文：“The State, Markets and Development: Beyond the Neoclassical Dichotomy”⁹⁶。展望二十世紀的台灣社會，爲了從「社會安全體系」的需求壓力，與「財政赤字」的困境中掙脫，唯一的辦法，似乎只有「超越市場與政府」。經由上文分析，本文獲致下列兩項基本結論：

首先，在應然面，根據前述「中華民國」憲法的規定，社會安全體系的有否建立，實際上，已牽涉「違憲」問題。除非修改憲法，否則，如果我們還「尊重」憲法的話，社會安全體系的建立，已刻不容緩。除此之外，在實然面，由於我國已邁入民主、多元化的資本主義，如果想繼續維持和平、穩定的發展，非有社會安全體系不可。

不過，關於社會安全體系與財政危機的關係，由前面的分析，社會安全體系的需求與財政危機，均是由組織的資本主義，邁向民主、多元化的資本主義，「必然」產生的結果，但是兩者並無「因果」關係。所以，第一，不能因有財政赤字而不要社會安全體系，第二，無社會安全體系，仍會有財政赤字，第三，有社會安全體系，並不一定會導致「財政赤字」。

至於政府介入社會安全體系，會不會導致「財政赤字」，答案應是肯定的，但至少台灣現階段的赤字，不是因爲「社會安全體系」所引起。社會安全體系與財政赤字的關連性，由圖二就一目了然。

其次，社會安全體系不同於傳統的「社會福利政策」，其主要功能：第一，不在濟貧，第二，不在重分配，而在於消除因市場經濟的「分配不均」問題，而產生對「個人」經濟安全的威脅，所以，其並非爲「社會利益」，亦非基於「社會正義」，而是「個人利益」；分配不均的降低，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除此之外，導致市場經濟的「分配不均」問題的產生，並非只是「純」市場因素，而是「政治經濟」因素，或政、經互動的結果。因此，不能期望透過「政府」的重分配，矯正分配的不均。「政府介入」並非唯一，亦非最適。第三，社會安全體系以「社會保險制度」爲主，社會保險制度既非市場亦非政府，而是介於兩者之間的「全新的社會組織」；但是社會安全體系除了社會保險制度以外，尚包括「國家撫卹」和「社會救助」，這三者並非相互排斥，而是相輔相成，各有所司。在此必須特別強調的：社會保險制度與國家撫卹、社會救助之主要區別，並不在保險



圖二：社會安全體系與財政赤字的關係

制度的「技術」層次，也就是主張，前者依「受益者付費原則」，以具有市場價格性質的「保險費」為財源，後兩者由依「能力原則」所徵收的租稅支應；社會保險制度異於傳統的國家撫卹和社會救助者，在於保險制度的「精神」層次，也就是強調「同舟共濟與互助自助」。一方面，其排除「政府」的介入或干預，另一方面，其排除市場「價格」的「排他性」^{①⑦}。

所以，社會保險「制度」的設計，必須堅守幾項原則：第一，社會保險與國家撫卹和社會救助之「責任範圍」，應該明確劃分，並與「政府」和「市場」形成嚴密有機的「安全網」^{①⑧}；第二，「保險團體」的形成，不能如商業保險，以「經濟能力」為依據，而是依「特定的資格」，只要符合特定的資格，不僅「必須」，同時「有權」加入^{①⑨}；第三，「保險團體」的界定，必須依循兩項基本原則：（一）被保險人彼此間有濃厚之「袍澤意識」或「群體認同」^{②①}。（二）一方面，給被保險人保留某種程度的「選擇空間」，另一方面，各保險團體之間，應維持相當程度的「競爭關係」^{②②}，同時，應受政府同等對待；第四，社會保險除了「風險分攤」外，由於其所承擔的「風險」為：「社會事故」的發生，而導致「經濟安全」受到威脅，這種風險無法「精算」，故個別的保險費率不能依「風險性」大小而定^{②③}。所以，「必然」產生重分配效果，不過，重分配效果必須限制在保險團體內；第五，社會保險「必然」是採「分攤制」(Umlageverfahren)，不牽涉「代際間」的移轉，同時，也非靠「資本累積制」(Kapitaldeckungsverfahren)^{②④}，可以運作的。

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先生，在最近出版關於：「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險之探討」一文中，曾提到：「福利國家之福利及保險政策，把政府導入『萬能政府(What government should do)』，不但導致官僚系統之擴大，亦因公權力之過度介入民間企業活動，損及企業活力與經濟發展之動力，……」^{②⑤}。這個看法，相信不僅是政府高階層決策官員的基本立場；同時，在該文之開頭與結尾，均引用Milton Friedman在"Free to Choose"一書中，對福利國家的批判，因此，亦代表國內奉Friedman為宗師之絕大多數主流「市場經濟學派」學者的看法。所以，最後，借用David Schweickart的話，作為本文的結語和回應：

"It hardly needs to be said that this book swims against the tide.(...) We should admit that we cannot get beyond capitalism at this moment not because there exists no viable, desirable 'beyond' but because those who most profit from the present order are too powerful. Simply that. In the face of such power, one may decide to cultivate one's garden, or to work to ameliorate the harsher aspects of 'actually existing capitalism,' or to struggle for radical transformation. A case might be made for any of these as an honorable option. What cannot be maintained, if the argument herein is sound, is that'

you need capitalism to ensure a reliable supply of goods and services, and to ensure that there will be enough taxable surplus left over to finance social welfare." (Schweickart, 1993, p ix).

(本文曾於八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內政部舉辦之「社會福利政策規畫背景分析研討會」中宣讀：作者現任中興大學財政學研究所所長)

◎註釋

①為避免與英文之"Social Security System"相混淆，本文的「社會安全體系」係採用德文的"Soziale Sicherung"，為「學理上的概念，其內涵在於：一方面以「社會保險」(Soziale Versicherung)為主體，另一方面，其並非「政府介入」。參考：Molitor (1987), 1. Teil, 特別是表二(S.10)。黃世鑫(一九九二)，第一節。和楊瑩(一九九二)，第一章。

②現在各國所實施的「社會保險制度」，其主要的重大缺陷，例如「勞、資共同負擔費率」，亦歸諸於百餘年前俾斯麥(Bismarck)的「政治考量」，Vaubel(1988)。

③社會科學雖然不能如自然科學，可以透過實驗加以「驗證」，但「歷史」的運用，可發揮「異曲同工」之效果。"Für Die Theorie der Sozialpolitik ergibt sich indessen eine andere

Blickrichtung. Für sie ist die Historie ein analytisches Experimentierfeld: auf ihm lassen sich typische Muster oder Modelle von Sozialpolitik ausmachen, die in der Menschheitsgeschichte eine Rolle gespielt haben. Im Unterschied etwa zum Physiker, steht den sozial- und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kein andere 'Prüfstand' als eben die Geschichte zur Verfügung." Molitor(1990), S.149.

④郭恒鈺(民國八十一年)，頁1101。

⑤國內標榜「自由派」的市場經濟學者，心中只有「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而且「愛、憎」分明，一聽到「社會」兩個字，就嚇得「屁滾尿流」。其實，如果好好研究「社會的市場經濟」，會發現她係專門針對希特勒極權的「組織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Eucken均稱之為Zentralverwaltungswirtschaft, Eucken, 1948)，且係以「自由主義」為基礎，所以，為便於分辨。一般以：Ordo-, vs. laissez-faire-, liberalism; individualistischer vs. dialektischer Neoliberalismus 參考：Wulff(1976), 2. Kapitel.

⑥"Verstehen wirtschaftlicher Wirklichkeit in aller Vergangenheit und in der Gegenwart und wahrscheinlich in aller Zukunft erfordert daher Verstehen wirtschaftlicher Macht und zugleich Durchschauen der auffallend gleichförmigen Kampfmethoden wirtschaftlicher Machtgruppen."

Eucken(1965), S. 196-197.

⑦關於西方工業國家十餘年來的「經濟改革」，例如民營化或「鬆綁」(deregulation)和近五年來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經革命」，相關的評估研究報告，已如汗牛充棟，可悲的是，國內經濟學者和政府決策官員對此均視而不見，或眼不見為淨。

⑧關於「政府角色」的界定，Block(1994)提出由“market reconstruction”這個“new paradigm”，取代“public goods state”，“macroeconomic stabilization state”，“social rights”，“developmental state”，“socialist state”等所謂“old paradigm”。

⑨借用Mayer的話：“but what I am trying to do is free economists from having to meet unrealistic criteria imposed on them by authoritarian colleagues.” Mayer (1993), p.5.

⑩這裡用「應然」和「實然」，而不用「規範」和「實證」，在於「應然」指的是憲法的「規範」，「實然」指的是「台灣」社會結構變遷的「實證」解構；而非只是經濟學慣用的「空泛」定義。

⑪Eucken在一九三九年第一版的序言中即指出：“Emporwuchern methodologischer Reflexionen ist ein Krankheitszeichen fuer jede Wissenschaft; aber durch Methodologie allein ist noch nie eine kranke Wissenschaft geheilt worden” Eucken (1965), S. IX

⑫“Je laenger ich mich mit ihr beschaeftigt habe, desto deutlicher habe ich gesehen, dass eine Antwort auf die gesellschaftlichen Krisen unserer Zeit eine radikale Aenderung derjenigen Denkhaltungen verlangt, die in irgendeiner Weise auf eine Variante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hinauslaufen.” Kramm (1979), S. 10另參考：Goldthorpe (1984), pp1-4.

⑬將政治經濟學的方法，發揮得淋漓盡致，首推Walter Eucken.根據其所提出之理念，而塑造的「社會的市場經濟制度」，對戰後德國經濟的快速重建與持續穩定發展，有相當程度的貢獻。Eucken (1952)，同時參考：黃世鑫，郭建中（一九九一），黃世鑫（一九九五）。

⑭Stewart (1991), p7, 同時參考Coats (1991), p.123.

⑮此乃“imperialism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Beaud and Dosaler(1993), pp 119-121.由於一方面受到「科學哲學」對方法論研究的衝擊，另一方面因自七〇年代開始，經濟理論對所謂經濟問題的「解釋」、「預言」(prediction)，和「解決」能力受到質疑，經濟學界，包括美國經濟學學會、英國皇家經濟學學會(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的領導人在內，普遍對經濟學的發展，感到憂心。反觀國內，不僅麻痺不仁，更可悲的是八〇年代以後出國留學的年輕學者，除極少數例外，卻似乎均未察覺此種轉變。更甚者，這些極少數一回到國內，馬上面臨「生存危機」，因為大多

數研究資源的分配，均掌握在這些已根深蒂固「學閥」的手中，除非你願意妥協，或做一個學術界的「清教徒」。另外，很諷刺的是：Milton Friedman由於其具有濃厚的「反共」色彩，在台灣的政治、學（經濟學）界，一直受到「愛戴」，而另一位John Kenneth Galbraith雖貴為哈佛大學教授，卻因其「左」的色彩，一直遭禁足。直到解嚴後，才有機會親臨久享「經濟奇蹟」盛名的寶島，且自此以後，其六〇年代所提出「社會失衡」"Social Imbalance"（即郝院長於六年國建計畫中，所用的「富裕中的貧窮」）亦得與Friedman的「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相提並論。台灣的經濟學界是否「保守」，由此可見一斑。

台灣的經濟學界的這種現象，借用Karl Popper的話，可能更為傳神：“In recent years, however, it has become fairly clear that affluence may also be an obstacle: too many dollars may chase too few ideas... Big Science may destroy Great Science, and the publication explosion may kill ideas.” Karl Popper (1975), *The Rationality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in: *Problems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Progress and Obstacles to Progress in the Scientifi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84-85. (引自Katouzian, 1980 Note 10.)。

⑮雖然社會學者一再強調：民間社會或社區主義，但台灣人民在這種「兩極化的二分法」之長期薰陶之下，能發揮多少效果，有待觀察。

。⑰例如醫院、學校，幾乎無一倖免，皆被作為「牟利」的工具，即使是宗教界經營的，不論新增或舊設，在經營理念方面，亦已漸產生「質變」。

⑱政風不好，說是薪水太低不足以「養廉」；學術研究成果不佳，就用國科會「獎助」；醫生拿紅包，就提高不開業獎金應付，連最近「醫界」亦理直氣壯，以「給付」太低，不足以確保「醫療品質」威脅；民意代表為民服務收紅包，亦是天經地義。

⑲此即“professionalization of economics”，Coats (1991), p119. 專業化的結果，乃如 Carr-Saunders and Wilson所描述的：“Every profession lives in a world of its own, The language spoken by its inhabitants, the landmarks familiar to them, their customs and conventions can only be learnt by those who reside there.” A.M. Carr-Saunders, and P.A. Wilson (1933), *The Profess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 iii. 引自Coats (1991), p119. 如根據Adam Smith之「分工專業化」的理論，專業化的結果應該可以提昇效率，但經濟學者專業化的結果，卻往往使其忘記學者的「社會責任」。除此之外，社會科學的研究，「分工專業化」後，如未予「整合」，再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將均成廢物。

⑳其與經濟學者不願或不須學方法論的道理相同：“The absence of methodological flag-waving is thus easy to understand.”

There is no territory to dispute and thus no need to wave one's flag." Boland (1991), p.88.

㉑ 即掌握 'professional ideology': "the set of ideas, beliefs, values, standards and behaviour patterns that differentiates one category of professionals from others." Coats (1991), p.121.

㉒ 參考 Mitchell and Simmons (1994)。

㉓ Berthold (1990)。

㉔ 如果同時比較 Keynes (1917, 1984), von Mises (1942, 1990), Friedman (1953, 1984) 等三篇文章，就很容易了解其演進過程。

㉕ Keynes 曾將政治經濟學分成兩派: "The concep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as a positive, abstract, and deductive science." (p.74) and "The concep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as an ethical, realistic, and inductive science." (p.79) 不過 Keynes 特別強調，這兩者不可偏廢。

㉖ 這種論點為奧地利學派最強調的地方，參考 von Mises (1942, 1990)。pp8-12. 同時亦是其與德國歷史學派的主要爭議點。

㉗ 所謂 "assumptions controversy", "The crux of the controversy, in essence, is the question: 'Should economic theory be judged by the realism of its assumptions or by the accuracy of its predictions?'" Stewart (1991), pp9-10.

㉘ 關鍵之處在對「模型」的意義，以及建構模型所需「假設」條件的功能的認知。由於社會現象太複雜，難以「一眼洞穿」，且又未能「分離」，而如自然科學，可以透過實驗加以「證明」，即對各種假說加以「品質管制」。因此，社會科學「模型」的建構，係為提供「假說」(hypothesis)，其均需經由「觀察」(observation)，而以「facts」為基礎，並採用削去法，以設定「假設」條件，排除「非相關」因素，並由模型的分析得出假說；然新古典經濟，則仿照自然科學，以「先驗」a priori 為基礎，以 ceteris paribus 為基本假設條件，且以自利的 homo oeconomicus 之行爲為研究對象。所以，「模型」的建構與自然科學的「實驗室」設立相同，(對社會科學不能實驗這點，Friedman 認為其與自然科學比較，只是程度上，非本質上的差異，Friedman (1953, 1984, p.215) 不過，功能則完全不同，自然科學的「實驗室」，係為「驗證」假說，新古典經濟的模型只是將假說呈現，所以，「假設」條件的功能，只是為凸顯其模型的「環境」與「現實環境」的差異。因此，利用這種模型分析所作的「預言」，必然陷入 "tautology"。請詳讀 Keynes (1917, 1984), pp85-93: "It may be said without qualification that political economy, whether having recourse to the deductive method or not, must both begin with observation and end with observation." (p.90)。

㉙ 奧地利學派並不認同此種發展，參考 von Mises (1942, 1990), pp4-8: "The social sciences never enjoy the advantage of

observing the consequences of a change in one element only, other conditions being equal". (p5), "But the chief objection which must be raised to the mathematical treatment of economic problems comes from another ground: it really does not deal with the actual operations of human actions but with a fictitious concept that the economist builds up for instrumental purposes. This is the concept of static equilibrium." (p.7).

③⑩這種典範實際上是取奧地利學派、洛桑學派和劍橋學派三者之「短」。

③⑪由政治經濟學到經濟學，不只是名稱的改變，亦牽涉研究主題的轉移。這種轉移始於十八世紀末，肇始者為以奧地利學派為首的「邊際分析學派」(Marginalism)，參考：Barry (1991)。但最後確立其在經濟學的地位為三〇年代的Robbins (1952)。這種研究主題的轉移，在因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興起，基本上是正確的，值得批評的是，其應只是傳統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新興」研究領域，而非「完全取代」之。所以，較正確的稱呼應為「市場經濟學」。奧地利學派則將經濟學研究主題鎖定在：“human actions”：“Economics deals with human actions, not as it is sometimes said, with commodities, economic quantities or prices.” von Mises (1942), p.8.但是對早期仍使用政治經濟學的學者，如J.N. Keynes，「經濟」只是形容詞：“...and in works on political

economy the term economic is generally employed simply and an adjective corresponding to the substantive wealth. By an economic fact, accordingly, is understood any fact relating to the phenomena of wealth. By economic activities are meant those human activities that direct themselves towards the creation, appropri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wealth, and by economic customs and institutions, the customs and institutions of human society in regard to wealth.” Keynes (1917), p 70.

③⑫“... it is certainly true that when marginalism was gaining acceptance among academic economists around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re was a concomitant narrowing of the discipline's scope (symbolized by the terminological shift from 'political economy' to 'economics'), a move that enabled economists to delegate to other social science specialists such troublesome issues as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wealth, the power structure and social justice.” Coats (1991), pp120-121.

③⑬“It may be remarked in passing that the description of economics adopted by Jevons in his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seems to give the science too much of a psychological, and too little of social, charac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s is described as "the mechanics of utility and self-interest" (p.23); it is "entirely based on a calculus of pleasure and pain; and the object of economics is to maximise happiness by purchasing pleasure, as it were, at the lowest cost of pain" (p.25). Keynes (1917, 1984), p.96. Note 13.

⑳ "In the economist's case a central tenet of this ideology is the conception of the neutral objective scientific expert..; and when this ideal is transported into the non-academic realm it often takes the form of partisan advocacy of efficiency and market methods(..) which, according to some critics, are given unwarranted priority over considerations of equity-.." Coats (1991), p.122.

所謂Pareto-optimum的效率並非客觀或價值中立，也就是效率並未比公平客觀。參考：Blaug (1985), pp591-592.

㉑ "What makes natural science possible is the power to experiment; what makes social science possible is the power to grasp or to comprehend the meaning of human action." von Mises (1942, 1990), p.9.

㉒ H. H. Mayer (1993), p. 2.

㉓ 指的是 Friedman (1953),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柯林頓 Lipsey (1963) 於其教科書 An Introduction to

Positive Economics 中加上 Karl Popper 之方法論，「自然」形成沿用至今的經濟學方法論。這種自然形成的方法論，主要建立在奧地利學派以市場經濟為研究主題的「方法論的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和洛桑學派「一般均衡」的「世界觀」，和劍橋學派的「功利主義」，如前所述，係取三者之「短」。其特質 Barry 有相當簡明扼要的描述：“..its belief in a body of 'objective' economic knowledge as precise and quantifiable as that found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its stress on exact prediction as an overriding goal and its desire to formalize and to mathematize economic phenomena.” Barry (1991), p69. 近數十年來一直到八〇年代初期，在社會科學中的方法論的探討，除少數例外，經濟學者並未參與。如 Boland 所言：“methodological paralysis”.

雖然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與洛桑學派有所不同，但其「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亦對此種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如果要區分他們之間的差異，似可這樣說明：即一強調“logical”另一強調“positivism”：Economics therefore is not based on or derived (abstracted) from experience. It is a deductive system, starting from the insight into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reason and conduct. As a matter of fact all our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of human action is based on and conditioned by the circumstance that we have this insight

in our mind. Without this a priori knowledge and the theorems derived from it we could not at all realize what is going on in human activity. Our experience of human action and social life is predicated on praxeological and economic theory.... Economics is not only not derived from experience, it is even impossible to verify its theorems by appeal to experience." von Mises (1942), p 9-10.

③有系統的由方法論解構經濟學或經濟學者的觀點，參考：Katouzian (1980)和 O'Brien(1991)。

④Keynes (1917, 1984), p 73.

⑤Blaug (1992, 1993), Ch.5.

⑥"..That positivism represents the avoidance of value judgement. (p96.)" 'positive' implied 'scientific', 'rational' and even 'objective' (p90.) Boland (1991).

⑦McCoskey (1986).

⑧"..should lead us to recognize that too often today economic positivism is mostly, and perhaps only, rhetoric. Boland (1991), p 102.

⑨所謂"positive"意義，其關係於"ethical or practical": In the first place, a sharp line of distinction is drawn between political economy itself and its applications to

practice. The func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is to investigate facts and discover truths about them, not to prescribe rules of life. Economic laws are theorems of fact, not practical." Keynes (1917), pp75-76.

⑩新古典經濟的模型係透過"ceteris paribus"和"the motive of self-interest"等兩項假設，將之排除。前者在去除「時、空」變動因素，也就是因「倫理」、「傳統」或所謂「文化」所造成的時、空差異；後者在去除人之「社會性」，亦即是因「倫理」、「傳統」或所謂「文化」對人類行為的影響。

⑪Friedman透過一個接一個的「定義」界定「科學」，並由此「定義」實證經濟學，其有嚴重「循環論證」的現象。其對所謂"reality"之意義亦加以扭曲，同時，所謂的 "prediction"係限定在研究者事先鎖定的「主題」和「框框」.."The ultimate goal of a positive science is the development of a 'theory' or 'hypothesis' that yield valid and meaningful (i.e., not trustic) predictions about phenomena not yet observed." (p213.), "Viewed as a body of substantive hypotheses, theory is to be judged by its preictive power for the class of phenomena which it is intended to 'explain' " (p214)" Turly important and significant hypotheses will be found to have 'assumptions' that are wildly inaccurate 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s of reality, and, in general,

the more significant the theory, the more unrealistic the assumptions (in this sense)... the relevant question to ask about the 'assumptions' of a theory is not whether they are sufficiently good approximations for the purpose in hand. And this question can be answered only by seeing whether the theory works, which means whether it yields sufficiently accurate predictions." (p218), Friedman (1953, 1984).

④ 這個問題在新古典經濟的規範中相當複雜。

⑤ 參考註①。

⑥ 本質上，社會科學並無理論與應用或理論與實證之分，只有「學術」(academic)和「實務」(practical)。參考Coats(1991), p133.

"The fields that are often loosely referred to as 'the sciences' divide their subject matter not only horizontally by fields, ... but also vertically by the level of abstraction, e.g. physics and engineering... In doing so they make room for different criteria at each level. In the social sciences we divide fields horizontally, but not vertically, so that economics comprises mathematical formalism, empirical science work, and applications to specific practical problems." Mayer (1993), p.24.

⑦ a priori 和 ceteris paribus 為建構新古典理論模型的基本假設。

⑧ "...the familiar complaints from those dissatisfied with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especially the excessive emphasis on a high level of abstraction, mathematization and formalization... and the irrelevance of much of this work to contemporary problems and especially policy issues." Coats(1991), p.134.

這亦是奧地利學派批判的地方：“It is a fallacy to recommend to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use of mathematics and to believe that they could in this way be made more 'exact.' The 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s does not render physics more exact or more certain. Let us quote Einstein's remark: 'As far as mathematical propositions refer to reality they are not certain and as far as they are certain they do not refer to reality.'" von Mises (1917, 1990), p.15.

⑨ 參考Mayer (1993), p.25.

⑩ "In this context, overemphasis on quantitative methods can be professionally as well as intellectually debilitating, for the solutions to complex policy problems can rarely be reduced to quantitative terms." Coats (1991), p.124.

③為矯正這種個體與總體的二分法，亦有提出“meso-”概念。meso為希臘文，即middle。不過，其太偏向「組織」層次。參考：Sharpe (ed.) (1993)。

④參考Blaug (1985), Ch.13. Blaug (1992, 1993), Ch.8, Mayer (1993), Appendix, pp37-40.

⑤早期Hargerger一般均衡租稅轉嫁模型並非真正的一般均衡，即使是I-O或CGEModel若仔細「檢驗」與一般均衡並不完全吻合。在這一點奧地利學派與洛桑、劍橋學派有其根本的差異。

⑥Blaug (1985), p.571.

⑦Walras的原意並不在此，Blaug (1985), p571. Walras提出一般均衡「理論」，係建立在「特定」的世界觀，其係一種「靜態的」。對這個問題，Schumpeter透過與Walras本人的直接討論，有相當深刻的體會和中肯的評論。參考：Schumpeter (1934, 1964), S. XXII-XXIII.

⑧Blaug (1985), p.584.

⑨一般往往照字面解釋“Second-Best”，以為所謂Second-Best指的是，即使多加上一個限制條件，雖不能達到Pareto-optimum，亦能達到Second-Best。其實Second-Best所要表達的為“... if there are at least two markets in which the optimum conditions are not satisfied, a policy change designed to break down imperfections in one of these two markets cannot be justified on Paretian welfare grounds. Moving towards a

Pareto optimality is not good enough: either we attain the first-best solution or there is nothing to choose between second-best, third-best and so forth.” Blaug (1985), p. 600.

⑩由統計分析能否得出「因果」關係，相關爭議文獻，參考：Granger (1969), Zellner (1994), Rubin (1986), Cox (1986), Glymour (1986), Granger (1986), Holland (1986)。

⑪典型的如“Phillips Curve”的產生，參考Stewart (1991). p.15.

⑫借用Thomas Kuhn所提出的“paradigm”旨在強調：科學研究，尤其是社會科學，所得的「知識」(knowledge)並非累積而成，同時，新的理論並非「推翻」舊的理論，新、舊理論若有不同，往往是外在環境的變遷。所以，前節雖然批判新古典經濟，但並不表示新古典經濟是「錯誤」，只能說新古典經濟之「典範」並不適合分析「台灣」現階段的經濟問題。因一方面，新古典經濟係針對十九世紀中資本主義剛萌芽時期的經濟問題；另一方面，新古典經濟係「美國化」(Americanization)的經濟理論，或許適合美國的「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Individualistic Capitalism)社會。參考Deane (1991), p.29. 且即是美國社會，亦已開始反省：Kuenne (1993)。

⑬另參考：Samuels (1994)。

⑭關於後工業化社會，參考：Hage and Powers (1992)。

⑮Schweitzer (1962), S. 33-35.

⑯Schumpeter (1934, 1964), S. XXII-XXIII.

⑦這裡的「動態」與「靜態」的區分，不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法，也就是，並非只是探討由一個均衡，被「外力」干擾後，向另一個均衡的「發展過程」，也並非只是探討「時間」，或“ceteris paribus”條件去除後之發展。而是Schumpeter所定義。Schumpeter對「動態」與「靜態」的區分，詳見Schumpeter (1934, 1964), Erstes Kapitel, Anhang. 而熊彼特兩種「模型」彼此間的區別，“Das statische Modell sieht dabei etwa so aus: Jeder Teilnehmer am Wirtschaftsprozess kann sebststaendig darueber entscheiden, an welscher Stelle des Produktionsprozesses er zu welchen Bedingungen Faktorleistungen anbieten,... Es gibt in diesem statischen Modell der Marktwirtschaft zwar eine staatliche Rechtsordnung, aber keinerlei prozesslenkende Intervention durch den Staat. Das System ist in dieser Hinsicht weitgehend anarchisch oder von staatlicher Herrschaft frei. Es ist jedoch weder planlos noch chaotisch: Denn Steuerungsinstrument fuer die Produktion jedes einzelnen Gutes und fuer den Einsatz aller Faktorleistungen ist das Preissystem, das zum Ausgleich der einzelwirtschaftlichen Interessen und somit zum gesamtwirtschaftlichen Optimum fuehrt. Partielle oder gesamtwirtschaftlichen Ungleichgewichte sind diesen

Modell im Prinzip fremd... Im dynamischen Modell wird daher versucht, die Marktwirtschaft unter wirklichkeitsnaeheren Annahmen zu analysieren. Man beruecksichtigt bei dieser Analyse nicht nur die in der Realitaet staendig auftretenden Ungleichgewichte auf den Maerkten, sondern z.B. auch die sich wandelnden Aufgaben und Anforderungen des Staates, soziale und gesellschaftliche Faktoren, Rolle und Einfluss der Verbaende sowie der Interessenorganisation im weiteren Sinne. Bei diesem dynamischen Verstaendnis der Marktwirtschaft muss die Frage nach der richtigen Aufgabenteilung zwischen Staat und Privatsektor stets neu gestellt und beantwortet werden.” Tietmeyer (1976), S. 21 -22.

⑧漢十六世紀中葉・田Wilhelm Roscher (1917-1894), Karl Knies (1821-1878), Bruno Hildebrand (1812-1886), Gustav Friedrich Schmoller (1838-1917), Adolph H.G. Wagner (1835-1917), Ludwig Joseph Brentano (1844-1931), Karl Bucher (1847-1930), Heinrich Herkner (1963-1932), Hasbach, Georg Friedrich Knap (1842-1926), Max Weber (1964-1920), Werner Sombart (1863-1941) 勃哈・古・青三代學者所代表的國民經濟學・田・其承襲Romanticische Schule der Deutschen

Nationalökonomie, Adam Müller (1779-1829), K.L.V. Haller (1768-1854), Fr.V. Baader (1965-1841); sie waren entschiedene Gegner der kosmopolitischen klass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und deren atomistische-individualistische Betrachtungsweise. Sie vertraten demgegenüber die organisch-universalistische Betrachtungsweise des Wirtschaftslebens als Teil der kulturellen Entwicklung einer Nation.¹

②⑨ Zukin and Dimaggio (1990), "The Crisis of Confidence in neoclassical Economics: The resurgence of economic dociology in the 1980s reflects a growing recognition,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of economics, that the discipline's dominant neoclassical paradigm suffers from serious limitations. (p.3).

③⑩ 參見 Keynes (1917, 1984), pp80-83.

③⑪ 例如 Lester Thurow 將美國和其他 Anglo-Saxon 國家歸類為 "Individualistic Capitalism"，以之與日本和歐洲大陸的 "Communitarian Capitalism" 相區隔。另外，Schnitzer 則將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包括部分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劃分為三種類型 .. U.S. Market Capitalism, Social Market Capitalism, State-Directed Capitalism. 參見 Schnitzer (1994), Ch.1.

③⑫ Wulff (1976), S.2. Schweitzer (1964), Appendix B: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Systems.

③⑬ Lange (1989), S. 11-12. Hirsch, Michaels, and Friesman (1990), "Sociology on the other hand tends to value description or explanation over prediction. That is, the realism of the concepts and proposition used, their resemblance to the perceptions and meanings of the participants, is highly valued. (p.40).

③⑭ Swedberg (1990), p.61, Table 3.1.

③⑮ 戰後合作主義的發展，參見 Maier (1984). Goldthorpe (1984, b) 典型採行合作主義制度的國家，為北歐各國和德國。採用二分法的學者，常批評瑞典的福利國家，是政府干預太多，事實上，瑞典的「政府」，並無太大的「權力」。參見 Schwerin (1984), Streeck (1984).

③⑯ Zukin and Dimaggio (1990), "this shift directed attention to individual rather than connective welfare, and private rather than public obligation. Embracing neoclassical models and metaphors enabled conservative leaders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many nations to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a "hard-nosed" realism that became more attractive to voters in a time of global economic competition. (p.1)... On the one hand, the re-emergence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has led to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inspired attempts by student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to develop sociological models of economic phenomena. Author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tradition have tended to focus on issues at the societal or "macro" level of analysis. Those i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al tradition have concentrated on the "meso" level of firms and markets. (p. 2)...

We believe that these two traditions in economic sociology -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the social organizational - need one another. (p.3)...

①本節參考：黃世鑫（一九九四）。

②economic changes. They were especially drawn to the mutual influences on growth and 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ors (e.g., industrialists and financiers) as well as noneconomic actors such as social classes and the state. (p.10).

③Esping-Andersen and Korpi (1984), Esping-Andersen (1994)

④參考：黃世鑫（一九九五），第一章。

⑤Shanahan and Tuma (1994).

⑥強調自然正義，事實上係封建社會的產物，對「世襲」的階級制度

給與合理化，維護貴族的利益。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如再強調自然正義，則只是將貴族換成「資本家」。

⑦Molitor (1990), S. 149-150.

⑧憲法與政、經制度之關係，參考：Bohling (1981).

⑨德國財政、經濟學者，探討政府的功能或經濟政策，決不會背離「社會的市場經濟制度」或憲法規範。參考：Tietmeyer (1976), Scholz (1976).

⑩例如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貨暢其流。

⑪"Das Ziel der Sozialen Marktwirtschaft ist es zum einen, die ökonomischen Aktivitaeten weitgehend von direkten staatlichen Reglementierungen zu befreien, um so der Dynamik des Marktes mit ihren effizienz- und wohlstandssteigernden Effekten zum Durchbruch zu verhelfen. Andererseits soll durch die staatliche Gestaltung der Rahmenbedingung des Marktprozesses, insbesondere durch die Schaffung einer Wettbewerbsordnung, einer Geld- und Waehrungsordnung und einer Sozialordnung, die Funktionsfaehigkeit der Marktwirtschaft langfristig gesichert werden." Klump(1986), S. 138.

⑫參考：林紀東（民國七十七年），第十三章。

⑬另一項重要原因為，一般認為「修憲」只有憲法或公法學者才是專家，這是大錯特錯。尤其是經、社條款，不是憲法學者可以掌握。

⑮參考：Schweitzer (1960), Schweizer (1964)。

⑯Carsonson (1990), Ch. 18. Schweitzer (1960), S. 442.

⑰Schweitzer (1962), S.36-41.

⑱這項特徵對了解所謂「政、商」關係甚為重要。因為在此種制度之下，所謂「政、商」關係，並非「赤裸裸」的政府與企業，而是有著痕跡的透過「政黨」與「產業公會」，這兩者都是非公非私的「人民團體」。例如國民黨與全國工業、商業總會。參考：Esenwein-Rothe (1965)。

⑲Kornai (1992), Ch. 3.

⑳由於效率並不具操作性的定義，所以在實務面，個體的效率就轉化為總體的「經濟成長」；並加以量化，以GDP的上升率為衡量指標。且由於經濟成長的貢獻，幾乎完全歸諸資本（不包括人力資本）的累積，總體的資本的累積又決定於個體的投資，投資決定於資本報酬率。至此一套公式化的簡單邏輯思考模式，已經不知不覺的形成：公平↗效率↗經濟成長↗\$（資本形成）↗\$（投資報酬率）。在台灣，不知是否巧合，效率也被定義為「經濟發展」，所以一方面，經濟學者可以在維持「自由主義」與支持威權政府的矛盾中，坦然自處。經濟學者與執政者心有靈犀一點通。經濟發展已成為獨一無二，且排他的「最高政策目標」，任何人都不能阻擋他，台灣也在經濟學者、執政者、技術官僚和資本家的通力合作下，創造經濟奇蹟。尤其者，不知是巧合，還是有意，台灣亦創造「效率&公平」雙贏的神話。直到政治解嚴，奇蹟的神話似乎一夕之間，都消

失」。

㉑Dutt, Kim, and Singh (eds.) (1994)。

㉒Rein (1989)。

㉓例如瑞士的社會安全體系，即強調“Three Pillars”，Wirth, Sager, Romer (1984)。

㉔一般強調「強制」與「自願」的區別，扭曲社會保險與商業保險之本質上的差異。商業保險並非是真正的決定於個人的「自由選擇」，自由選擇只是有「經濟能力者」才享有。另外，社會保險的強制與政府強制並不同，社會保險的強制是一種「團體責任」的表現，而非如政府的強制，來自「他人」的強迫；同時社會保險的強制，不只是針對被保險人，亦針對保險人，所以，對被保險人而言，社會保險的強制亦是一種「權利」。

㉕參考：Braun, n.a. (1981)

㉖參考：Le Grand and Bartlett (eds.) (1993)。

㉗“In several of the explanations of redistributional objectives, a key role is played by uncertainty...Haveman (.), has recently argued, for example, that ‘the primary economic gain from the welfare state is the universal reduction in the uncertainty faced by individuals’. In this context it is, however, importan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risk’ and ‘uncertainty’.... On the other hand, fears that there will be widespread recession, or a

breakdown of family support for the aged, are not easily translated into the expected unitarily calculus. They are spurces of uncertainty for which insurance in a narrow sense may be inapplicable. What is required is mutual support of a kind described by the French term 'solidarite' or by Beveridge's phrase that 'men should stand together with their fellows'..." Atkinson (1987), p. 795.

⑩即隨收隨付與基金制，不過，這兩個概念容易誤解。因隨收隨付亦設有基金，所以，德文的分攤制與資本累積制較清楚。

⑪徐立德（民國八十三年），頁一四六。

參考文獻：

- 林紀東（民國七十七年），*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第四冊，四版，台北：三民書局。
- 徐立德（民國八十三年），*平等與效率*，台北：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 郭恒鈺（民國八十一年），*德意志帝國史話*，台北：三民書局。
- 黃世鑫、郭建中（一九九一），*企業在整體政經發展中之角色*，企業、政府與社會間關係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頁一一—三六。

黃世鑫（一九九二），*全民社會醫療保險制度之基本原則和架構*，黃世鑫等，*我國全民社會醫療保險制度之研究*，台北：業強，第二章。

——（一九九四），*福利國家vs.／&財政赤字？被「閹割」的現代財政理論！社會福利與經濟發展研討會*（八三，五，七），台北：中國經濟學會主辦。

——（一九九五），*財政理論與政府預算*，黃世鑫、徐仁輝、張哲琛編著：政府預算，台北：國立空中大學，第一篇。

楊瑩（一九九二），*英國社會安全制度之重要改革及不同措施之比較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Atkinson(1987), Anthony B., *Income Maintenance and Social Insurance: A Survey*, in: A.J. Auerbach and M. Feldstein(eds.), *Handbook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2, New York: Elsevier Science Publications Co., Ch. 13, pp779-908.

Balabkins(1988), Nicholas W., *Not by Theory alone...: The Economics of Gustav von Schmoller and Its Legacy to America*,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Barry(1991), Norman P., *Austrian Economics: A Dissent From Orthodoxy*, in: D.Greenaway, M.Bleaney and I. Stewart(eds.),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h. 5, pp 68-87.

- Beaud(1993, 1995), M., and G. Dostaler, *Economic Thought Since Keynes: A History and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Hants: Edward Elgar.
- Benda(1986), Ernst, *Grundgesetz und Wirtschaftsordnung*, in: R. Vaubel und H.D. Barbier(Hrsg.), *Handbuch Marktwirtschaft*, Pfullingen:Neske, S.144-149.
- Berthold(1990), Norbert, *Sozialpolitik zwischen ökonomischer und politischer Rationalität*, in: *Hamburger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und Gesellschaftspolitik*, 35. Jg., S. 171-185.
- Blaug(1985), Mark,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Fourth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2, 1993), *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Or How Economist Explain*, seco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lock(1994), Fred,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Economy*, in: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eds.),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 28, pp691-710.
- Bohling(1981), W., *Wirtschaftsordnung und Grundgesetz*, Stuttgart, New York: Gustav Fischer Verlag.
- Boland(1991), Lawrence A., *Current Views on Economic Positivism*, in: D.Greenaway, M.Bleaney and I. Stewart(eds.),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h. 6, pp88-104.
- Braun(1981), Hans, u.a., *Selbstverwaltung in der Solidargemeinschaft: Das Recht der sozialen Sicherung und der Verwaltungswille des Bürgers*, Baden-Baden: Nomos.
- Carson(1990), Richard L.,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New York, London: M.E. Sharpe.
- Coats(1991), A.W., *Economics as a Profession*, in: D. Greenaway, M.Bleaney and I. Stewart(eds.),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h. 8, pp119-142.
- Cox(1986), D.R., *Comment*,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Vol. 81, pp 963-964.
- Deane(1991), Phyllis, *The Role of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in: D. Greenaway, M. Bleaney and I. Stewart(eds.),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h.3, pp25-48.
- Dutt(1994), A.K, and K.S. Kim, A. Singh(eds.), *The State, Markets and Development: Beyond the Neoclassical Dichotomy*, Hants: Edward Elgar.

- (1994), *The State, Markets and Development*, in: Dutta(1994), A.K. and K.S. Kim, A. Singh(eds.) *The State, Markets and Development: Beyond the Neoclassical Dichotomy*, Hants: Edward Elgar.
- Bucken(1948), Walter, *On the Theory of the Centrally Administered Economy: An Analysis of the German Experiment*, in: *Economica*, Vol. XV, Part I: pp79-100, Part II: pp173-193.
- (1952, 1975), *Grundsätze der Wirtschaftspolitik*, 5., unveränderte Aufl., Tübingen: J.C.B. Mohr.
- (1965), *Die Grundlagen der Nationalökonomie*, achte Aufl., Berlin, Heidelberg,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Esenwein-Rothe(1965), Ingeborg, *Die Wirtschaftsverbände von 1933 bis 1945*,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 Esping-Andersen(1984), Gosta, and W. Korpi, *Social Policy as Class Politics in Post-War Capitalism: Scandinavia, Austria, and Germany*, in: J.H. Goldthorpe(ed.), *Order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8.
- (1994), *Welfare States and the Economy*, in: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eds.),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 29, pp711-732.
- Friedman(1953), Milto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Cambridge 1984. Ch. 10, pp 210-244. (Reprinted from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lymour(1986), Clark, *Comment, Statistics and Metaphysics*,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Vol.81, pp964-966.
- Goldthorpe(1984,a), J.H., *Introduction*, in: J.H. Goldthorpe(ed.), *Order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1-14.
- (1984,b), *The End of Convergence: Corporatist and Dualist Tendencies in Modern Western Societies*, in: J.H. Goldthorpe(ed.), *Order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 13.
- Granger(1969), C.W.J., *Investigating Causal Relations by Econometric Models and Cross-Spectral Methods*, in: *Economica*, Vol. 37, pp424-438.
- Granger(1986), Clive, *Comment*,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Vol. 81, pp967-968.
- Hage(1992), J., and Ch. H. Powers, *Post-Industrial Lives:*

- Roles and Relationships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SAGE.
- Hirsch(1990), P., S. Michaels, and R. Friesman, Clean Models vs. Dirty Hands: Why Economics is Different from Sociology, in: Zukin and P. Dimaggio (eds.), Structures of Capita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2
- Holland(1986), Paul W., Statistics and Causal Inference,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Vol. 81, pp945-960.
- (1986), Rejoinder,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Vol. 81, pp968-970.
- Katouzian(1980), Homa, Ideology and Method in Economics,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Keynes(1917), John Neville,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 4th ed., London: Macmillan, (Excerpted in: 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Cambridge 1984, Ch.2, pp70-98).
- Klump(1986), Rainer, Historische Wurzeln, in: R.Vaubel und H.D. Barbier(Husg.), Handbuch Marktwirtschaft, Pfullingen: Neske, S.138-143.
- Kornai(1992), Janos,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Kramm(1979), Lothar, Politische Ökonomie: Eine Kritische Darstellung, München: Verlag C.H. Beck, Kuenne(1993), Robert E., Economic Justice in American Societ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ange(1989), Elmar, Marktwirtschaft: Eine soziologische Analyse ihrer Entwicklung und Strukturen in Deutschland,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 Le Grand(1991), Julian, Equity and Choice: A Essay in Economics and Applied Philosophy, London: Harper Collins Academic.
- (1993), and W. Bartlett(eds.), Quasi-Markets and Social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 Maier(1984), Charles S., Preconditions doe Corporatism, in: J.H. Goldthorpe(ed.), Order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 2
- Mayer(1993), Thomas, Truth versus Precision in Economics, Hants: Edward Elgar.
- McCoskey(1986), Donald N..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Brighton, Sussex: Harvester Press.
- Mitchell(1994), W.C., and R.T. Simmons, Beyond Politics:

- Markets, Welfare, and the Failure of Bureaucracy, Boulder, San Francisco, Oxford: Westview Press.
- Molitor(1987), Burno, Soziale Sicherung, München: Verlag Franz Vahlen.
- (1990) Sozialpolitiksgeschichte in theoretischer Sicht, Hamburger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 und Gesellschaftspolitik, 35. Jg., S.149-170.
- von Mises(1942), Ludwig, Social Science and Natural Science, in: 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 and Jurisprudence, Vol. 7. Reprinted in: Ludwig von Mises, Money, Method, and the Market Process, Norwell, Massachusetts 1990, Ch. 1.
- O'Brien(1991), Denis P., Theory and Empirical Observation, in: D.Greenaway, M.Bleaney and I. Stewart(eds.),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h. 4, pp49-67.
- Platt(1991), Jennifer, The Contribution of Social Science, in: M. Loney, et al.(eds.), The State or The Market: Politics and Welfare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2nd ed., London: Sage, Ch. 19, pp339-350.
- Rein(1989). Marti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Institutions: Neither Public nor Private, in: S.B. Kamerman and A.J. Kahn(eds.), Privatiz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2.
- Robbins(1952), L., An Essay on the Nature &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sec. Ed., London: Macmillan.
- Rubin(1986), Donald B., Comment, Which Ifs Have Causal Answers,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Vol. 81, pp961-962.
- Samuels(1994), Warren J., The Roles of Theory in Economics, in: P.A.Klein(ed.), The Role of Economic Theory, Boston/Dordrecht/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Ch.2.
- Schnitzer(1994), Martin C.,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6th Ed., Cincinnati(Ohio): South-Western Publishing Co..
- Scholz(1976), Rupert, Grenzen staatlicher Aktivitaet unter der grundgesetzlichen Wirtschaftsverfassung, in: Dieter Duwendag(Hrsg.), Der Staatsektor in der sozialen Marktwirtschaft,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S. 113-133.
- Schott(1984), Kerry, Policy, Power and Order: The Persistence of Economic Problems in Capitalist Stat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chumpeter(1918, 1954), Joseph, The Crisis of the Tax State,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apers, pp5-38.
- (1934, 1964),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Ein Untersuchung über Unternehmervergewinn, Kapital, Kredit, Zins und den Konjunkturzyklus, Sechste Aufl.,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 Schweickart(1993), David, Against Capit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weitzer(1960), Arthur, Business Power Under the Nazi Regime, in: Zeitschrift fuer Nationaloekonomie, Bd.XX, S. 414-442.
- (1962), Der organisierte Kapitalismus: Die Wirtschaftsordnung in der ersten Period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 in: Hamburger Jahrbuch fuer Wirtschafts- und Gesellschaftspolitik, 7. Jg., S.32-47.
- (1964), Big Business in the Third Reich,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 Schwerin(1984), Don S., Historic Compromise and Pluralist Decline? Profits and Capital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in: J.H. Goldthorpe(ed.), Order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
10. Shanahan(1994), S.E., and N.B. Tuma, The Sociology of Distribution and Redistribution, in: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eds.),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 30, pp733-765.
- Sharpe(1993), L.J.(ed.), The Rise of Meso Government in Europe, London: SAGE.
- Stewart(1991), Ian M.T., The Role of the Methodologist, in: D. Greenaway, M.Bleaney and I. Stewart(eds.),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h.2, pp 7-24.
- Streck(1984), Wolfgang. Neo-Corporatist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the Economic Crisis in West Germany, in: J.H. Goldthorpe(ed.), Order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
- (1985).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Community, Market, State-And Associations? The Prospective Contribution of Interest Governance to Social Order, in: W.Streck and Ph.C. Schmitter(eds.), Private Interest Government: Beyond Market and State, London: SAGE, Ch. 1.
- Swedberg(1990), R., and U.Himmelstrand G. Brulin. The

- Paradigm of Economic Sociology, in: S.Zukin and P. Zukin(1990), Sharon, and Paul DiMaggio, Introduction, in: S. DiMaggio(eds.), Structures of Capita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 3.
- Tietmeyer(1976), Hans, Die Aufgabenteilung zwischen Staat und Privatsektor in der Sozialen Marktwirtschaft, in: Dieter Duwendag(Hrsg.), Der Staatsektor in der sozialen Marktwirtschaft,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S. 21-36.
- Vaubel(1988), Roland, Die Mißbrauch der Sozialpolitik in Deutschland: Historischer Überblick und Politisch-Ökonomische Erklärung, Hamburger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und Gesellschaftspolitik, 33. Jg., S.39-64.
- Wirth(1984), P., U. H.Saager, B.Romer, Die zweite Säule: BVG und Berufliche Vorsorge, Zuerich:U. Baer Verlag.
- Wulff(1976), Manfred, Die neoliberale Wirtschaftsordnung: Versuch einer dynamischen Analyse der Konzeption und der Realität, Tübingen: J.C.B.Mohr.
- Zellner(1994), Arnold, Causality and Econometrics, in: D.J. Poirier(ed.), 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etrics, Vol. I, Hants:Edward Elgar, Ch. 27, pp278-323.
- Zukin and P. DiMaggio(eds.), Structures of Capita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36.